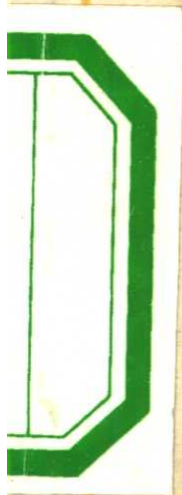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史丛书

太平天国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丛书

太平天国革命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编写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我们编写这套《中国近代史丛书》，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以供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以及若干近代历史人物，陆续出书。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

我们这个编写组，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甚至可能存在错误，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

目 录

一、风暴前夜·····	1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8
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	17
四、建都后的措施·····	27
五、北伐和西征·····	37
六、打垮江北、江南大营·····	46
七、天京的变乱·····	52
八、防御中的攻势和“新政”的提出·····	57
九、天京再次解围和大军东进·····	65
十、安庆保卫战前后·····	73
十一、和外国侵略者对阵·····	81
十二、革命形势危急·····	89
十三、天京陷落·····	96
十四、再接再厉的斗争·····	104
十五、太平天国英雄们永垂不朽·····	108

一、风暴前夜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是著名思想家、诗人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前一年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清朝统治者不去讲求盐铁生产事业，不去兴修黄河水利，只知榨取东南各省的财富，每亩田定额税米三升，经过官吏的层层勒索，人民竟要缴纳一斗，以致无法生活，愤激到还不如把耕牛杀掉另寻出路的好。这里的“东南”，是指长江下游的富庶地区，清朝政府的漕粮主要是取之于这个地区。所谓漕粮，就是把从东南各省征来的粮食，由运河运往北京，以供官员和军队消耗。这是一首写实的诗，它通过对东南赋粮压榨的典型，揭示出那时中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因此，诗人早就忧心忡忡（音充 chōng）地喊道：“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预告农民反抗的大风暴又将来临，向清朝统治者敲起了警钟。

经过鸦片战争，在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社会的矛盾发展了，危机加深了。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强抢勒索，单白银一项，在各

地就抢去不少，最后还夺取了二千一百万元的巨额赔款。如果加上侵略军的掳掠破坏和清朝政府支付的战费，为数就更大了。这些突如其来的负担，不是直接取之于人民，就是间接转嫁到人民头上。

鸦片的流毒，战前已很严重，鸦片战争就是由贩烟和禁烟的斗争开始的。战后，英、美侵略者公然以香港为贩毒基地，向中国沿海各口倾泻鸦片，数量年年增加，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年激增至五、六万箱。鸦片用现银交易，每年流出的白银达二、三千万两。洪秀全起义时，痛斥清朝政府“每年花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以有用之钱，换害人之物，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由于白银大量外流，银价上涨、钱价下跌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起来。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原来是每两换钱一千文左右，到一八四〇年每两换钱为一千六百文上下，到一八五〇年竟可换上二千二、三百文了，比原来上涨了一倍多。而农民、手工业者出卖劳动力和零售产品，是按钱文计算的，收入没有什么增加；他们缴纳赋税的时候，却要把铜钱换成白银，或者按银折算，赋额即使照旧，实际负担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如果把抬高银价和浮收等情事算进去，往往赋银一两，人民要费去八、九千文以至十千文以上的铜钱，比起“国赋三升民一斗”来，又高出了许多。

五口通商后，洋纱洋布等消费品不断涌来，例如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一八四二年为九六九、三八一镑，一八四五年上升为二、三九四、八二七镑，其中棉纱总值是九九、九五八

磅，棉布总值是一、六三五、一八三磅。由于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抵制，以及鸦片换走大量白银对一般贸易的影响，此后几年一般对外贸易有所下降。但是外国纱布的输入，却排挤了中国的土纱土布，夺去了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市场。一八四五年就有人指出这种情况，说：“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闽产之土布亦因之壅（音拥 yōng）滞不能出口”。江苏的松江、太仓一带，本来是手工纺纱织布业最发达的地方，这时也已“销减大半”。这种影响，由沿海、沿江逐步推向内地，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手工业日趋衰落，向工场发展的道路被阻塞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失业。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马克思在当时就已深刻地指出，他说：“中国在 1840 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①

旧税捐加新税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者的压榨，在鸦片战争后造成的普遍现象。清朝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和解决银荒，不仅用摊赔、代赔等名目向各省搜括，还以“筹划经费”的名义，进行加赋加价，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地丁税是清朝政府压榨人民的主要项目，占其总收入的四分之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一
一页。

三，从一八四一到一八四九年增加了三百几十万两。食盐是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长芦盐原定官价每斤十六文至二十四文，一八四六年距产地近的涨价至三十三、四文，距产地远的涨价至六、七十文。各种税捐，通过银钱折价和官吏勒索，人民的实际负担，都是额定的几倍或十倍以上。人民缴纳不起，州县的催逼急如星火，关押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连反动官僚曾国藩（音凡 fān），在一八五〇年也承认这种情况是“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

封建社会里，掠夺土地和通过土地进行掠夺，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基本手段。鸦片战争前几十年，已有人指出，“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土地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却在贫困中煎熬。随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剧烈冲击，官吏更加贪婪（音兰 lán），百般搜括现银；地主不断扩大货币地租和提高押租，吸取现银；富商、高利贷者则利用银货折价和放印子钱，进行重重盘剥。在这些吸血鬼的压榨下，广大农民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耕地，变为赤贫，连一些小地主也濒于破落，土地为少数人占有的集中程度，达到了高峰。当时苏州府的常熟、昭文（后并入常熟）两县，小户的田产，多卖与“富豪强梗”的大户，这一趋势，当时有人说“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音扼 è）”。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〇至一八五〇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土地一百九十六亩多。广西桂平、贵县、平南、象州、陆川等地，大部分土地被大地主霸占，有一批占地几百亩

至几千亩，收租谷几十万斤至上百万斤的地主。这些情况，可以作为全国的缩影，当时拥有三千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几乎到处都有，甚至有拥田万亩、十万亩、百万亩的大地主存在。所以，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集中在占少数人口的地主阶级手里。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那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正在空前激化。这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一处天地会起义的布告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更在他的自述中说：“自和番（指清朝政府向英国投降，签订《南京条约》）之后，吹烟更多，番货涌涌而来，百姓不知何由。看到各处设关设卡，官府压制从番，世界大变，大家无银可使，无饭可食，人人拜隘（广东话，愁闷的意思）。”他们以切身经历，用简明的语言，说出了人民和统治者的根本对立以及矛盾的根源。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各地农民和手工业者都纷纷揭竿而起，少数民族也群起反抗。十年间，从抗捐、抗租、抗粮，到攻城占地、打江山的大小起义，计有一百多次。这些起义，大多数都是由会党一类民间组织策动的，如北方各省的白莲教、天理教，河南、安徽、山东一带的捻（音碾 niǎn）党，四川、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斋教。而天地会的势力更盛，几乎遍布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由它发动的起义，也最为频繁。会党是早已在民间流行的反抗力量，但

在鸦片战争后特别活跃起来，证明压迫大反抗力量也就愈大，压迫是驱使群众走向革命的条件。

各地掀起的武装起义，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比较突出，声势最盛，广西并且很快成为反抗力量汇合的基地。因为这三省在鸦片战争中的激荡很大，除了广东直接遭受战火侵害外，清朝政府从三省征调的兵力最多，战后裁遣，许多士兵流散于这个地区。这里，长期以来又是天地会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活动的地区，失业群众和遣散士兵，无家可归，大都投入天地会，天地会的山堂大大发展起来。加上连年灾荒，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也卷入了斗争的行列。所以，三省不断地燃烧起反抗的怒火，而广西是清朝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火焰汇集到这里，就越烧越旺，日益形成为燎原之势。三省的重要起义有：

一八四三年，湖南武冈曾如炷(音注 zhù) 占据洪崖洞起义。

一八四四年，湖南耒(音垒 lěi) 阳阳大鹏率领两千余人起义，持械攻城。

一八四五年，广西藤县邓立奇、钟敬敏率领群众在赤水墟(音须 xū) 起义；广东香山(今中山)、新会、顺德等处农民连续暴动。

一八四六年，湖南新田王宗猷起义，广东北流也发生农民反抗斗争。

一八四七年，湖南新宁天地会首领雷再浩和广西全州李世德，在湘、桂边境发动起义，进攻全州，同清军战斗了两个月，广西、湖南的天地会纷纷响应。

一八四八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出现了高潮。张嘉祥在横山起义，活动于粤、桂边境的钦州、灵山、贵县、横山等地，队伍发展到万余人。张嘉祥后来投降清军，成为地主阶级的鹰犬。陈亚贵联合广东钦州、广西宾州的农民武装几千人在武宣起义，一度攻破广西中部的修仁、荔浦两座县城，其后转战象州、武宣、贵县等地，一直战斗到太平军起义爆发以后。张钊等率领艇军在梧州起义。这支起义军长于水战，曾经控制了广西的主要水道。

一八四九年，雷再浩的部下李沅发，在雷再浩牺牲后，率领所部又在湖南新化起义，攻破县城，杀县官，开仓库，砸监狱，大杀地主阶级的威风。随后转战湘、桂边境的高山丛林中，打败了地主团练（镇压农民的地主武装）的围攻，队伍扩大到四、五千人，进入广西，战斗于融县、永宁、永福、阳朔、荔浦、修仁等处。这年，广西发生大灾荒，饥民千百成群，无路可走，纷纷同天地会汇合，打出“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等旗号，攻占城池，多至数十起，各有数百人、数千人不等。李沅发是影响较大的一支。

到一八五〇年和一八五一年间，广西的革命形势吓坏了反动统治阶级，官绅上告，皇帝“查问”，嚷成一片。他们惊呼“广西盗贼充斥，蔓延最盛”，达二、三十股，还“有尚弟会匪，啸聚万人”的可怕力量。这个“尚弟会”，就是指洪秀全领导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

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洪秀全，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埗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官禄埗村在广州北面，离广州城约百里。他童年一边伴随父兄劳作，一边读书，十八岁开始充当村里的私塾教师，是一个深知民间疾苦，同贫苦农民有血肉联系的乡村知识分子。他曾多次去广州考秀才，都没有考上，精神上受了不少折磨。而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严重后果，到处都在激起人民的反抗，这些更给予洪秀全以极大的震动，把他一步步引向革命的道路。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洪秀全就是一个最早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就已进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活动。商人带来了鸦片，传教士则带来了精神的鸦片——基督教，广州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地方。

一八三六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出场，遇到传教士在街头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八页。

传道，散发宗教书册，他得到一部基督教的传道书——《劝世良言》。这部传道书是一个中国教徒梁发编的，梁发原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助手。在这以前，来中国的传教士都属于天主教派，马礼逊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于一八〇七年到广州，来往于澳门、麻六甲等地。为了利用宗教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他学习中文，把新约、旧约(圣经)用中文翻译出来，是圣经最早的一个中文全译本。《劝世良言》从这个译本中摘引若干段落和故事，加以解释发挥，印成九个分册，近十万字。洪秀全把《劝世良言》带回家中，翻阅后就丢开了。次年，洪秀全再试落第，愤世嫉俗的情绪越发不能抑止，大病一场，病中若梦若狂，假托上帝痛斥孔子，说“妖魔作怪”，总由“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有时大呼“斩妖，斩妖，斩呀，斩呀！”并吟作了“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诗句。洪秀全的思想和基督教开始在这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不过是借用上帝的名义，宣告自己受命于天，负有特殊使命，为将来干“斩邪留正”、打破人世间不平的革命事业，进行精神准备。

此后数年，洪秀全仍在乡下教书，以维持生活。一八四三年，他最后参加了一次令人憎恨的科举考试。这时，刚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不久，清朝政府军事、政治上的腐败已暴露无遗，他从此与封建的科举仕途完全决裂，立志要推翻清朝的统治。“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等诗句，又写出了他一待时机成熟，就要投身革命的胸怀。他记起了那部久被搁置的《劝世良言》，捡出来与同学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看，

想从中找出一些名堂来。书中渲染的宗教洗礼，却给他们提供了进行组织的借鉴，在家乡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最早的一个小组。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華(上帝)之子、基督(耶穌)之弟，下降凡間，拯救世人。馮云山也是花縣一個村塾教師，從此與洪秀全結為戰友，成為拜上帝會的組織者。

《勸世良言》同基督教其他的傳道書一樣，無非是勸人崇拜那個捏造出來的“造物主”、“獨一真神”——上帝，宣揚“地上無實福，天上才有福”，要“愛爾仇”(愛你的仇敵)等等，用以麻痺人們對現實世界(剝削階級統治的世界)的反抗意志，教人去追求彼岸世界(所謂天堂)的幸福。可是，洪秀全卻從宗教說教中，得到了相反的啟示。他認為，既然除上帝之外，其他被人們崇拜的偶像是妖魔，那末為什麼農民不可以站到“上帝”的一邊，向孔子、閻羅王、皇帝等妖魔宣戰呢？既然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那末為什麼農民不應該起來為自己被剝奪的平等權利而鬥爭呢？可見，拜上帝會雖然帶有宗教色彩，但剝去它的神秘化外衣，不容置辯是一個革命組織。它揭示了與宗教背道而馳的鬥爭哲學。

所以，洪秀全寫的許多詩歌，不是為上帝唱贊美詩，而是發抒自己的革命頑強鬥志，例如：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為家共飲和。

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奸宄(音軌guǐ)落天羅。

東南西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

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這是說江山要用寶劍去開辟，只有“擒盡妖邪”、“收殘奸宄”，

才能出现“四海为家共饮和”的“太平一统”世界，幸福是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的。他铸了长约三尺的宝剑，刻上“斩妖剑”三个字，随身佩带。上面的第一句诗，就是以写实来显示他的决心的。接着，他打碎了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不顾那些乡绅族老的非难，向两千多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思想权威挑战，勇敢地迈出了战斗的第一步。

一八四四年春，洪秀全偕同冯云山等前往外地活动，沿途藉贩卖笔墨补贴费用。历经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山、连山等地，西入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他们在贵县赐谷村努力工作了几个月，吸收信徒百余人。这是洪秀全、冯云山初入广西为太平军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种子。洪秀全得知赐谷村附近的六乌（亦作六窠）山，有座六乌庙，奉祀一男一女妖神。他又以诗歌为斗争武器，题诗申斥六乌神为“该诛该灭两妖魔”，引导群众向牛鬼蛇神开火。这年冬天，洪秀全因为在广西一时还打不开大的局面，返回广东，冯云山则仍留广西活动。

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洪秀全在蛰居家乡、继续教书期间，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宣传革命的文献。

在这些文献中，洪秀全从农民的革命要求出发，吸取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把它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揉合起来。洪秀全揭露当世的黑暗：“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对古代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表示向往。把相亲相爱的理想社会，与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实世界相对照，表示对现

存秩序的强烈仇恨，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王国。在这些文献中，洪秀全表达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封建阶级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说：“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洪秀全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女子都是姐妹，不应该有此疆彼界的分别，更不应该有你吞我并的念头。他十分尖锐地指出，决不容许这个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不平世界再存在下去，主张国与国平等，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贫与富平等，充满了对封建主义战斗的勇气。

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更揭示了战斗的目标，他痛斥“阎罗妖”和“妖徒鬼卒”对人们的“缠捉磨害”。这些“阎罗妖”和“妖徒鬼卒”，不止是指的缠捉人们头脑的那个阴府系统，而且也是清朝皇帝及大小封建统治者的象征，是一切罪恶的渊藪，人人当奋起“共击灭之”。就是说，他要和群众一起，打翻形形色色的封建偶像。

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听说广州有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便和洪仁玕一起前往广州去找他，向他寻求真理。罗孝全这个美国传教士，积极从事宗教宣传，麻醉中国人民，对洪秀全不信任，不愿接受他入教。洪秀全在那里两个月，接触了新约、旧约(圣经)，结果和罗孝全闹翻。后来罗孝全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说：“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说对了！罗孝全和洪秀全各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正是他们的根本分歧所在。不久，洪秀全重入广西，同在桂平县紫荆山开展工作的冯云山会合，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

广西被地主阶级诬蔑为“多盗之都”，这从反面说明了那里的阶级斗争尖锐，和农民群众富有反抗精神。紫荆山是一个贫瘠的山区，重峦(音栾luán)叠嶂，纵横数十里，山区群众除种地外，多以砍柴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冯云山于一八四四年与洪秀全分别后，就来到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以做工、当私塾教师为生，和这里的贫苦群众共同生活了三年。他经常在夜间翻山越岭到各村落宣讲拜上帝会的道理，由于他坚毅而热情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加入拜上帝会的人渐渐多起来。

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来到紫荆山，正是广西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时候。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两三千会众的革命组织，遍布于象州、潯州、郁州、平南、武宣、贵县、博白等地。洪秀全看到冯云山辛勤建立起来的这个革命基地，大喜过望。会众早经冯云山推崇，对洪秀全的到来，无不真心服从，呼为“洪先生”。从此，在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共同努力、共同筹划下，拜上帝会的号召力日益扩大，革命势力更为活跃了。他们深入各个山村进行宣传，并带领群众捣毁庙宇，砸烂菩萨，开展斗争。

洪秀全听说象州有一个甘王庙，民间传说这个“甘王”很“灵验”，都害怕他。洪秀全为了打破群众的迷信，便和冯云山一起率领群众前往象州，跑到庙里，用大竹竿痛打这个“甘妖”，揭露他的十大罪状，责令他永远不准再残害人民，并叫四个人把他的眼睛挖出，胡须拔掉，帽子踏烂，龙袍扯碎，手脚扭断。

洪秀全率领群众捣毁甘王庙的事，传闻很广，影响很大。

他不只是打掉了一个“甘王”，而是在砸碎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鼓舞群众的斗争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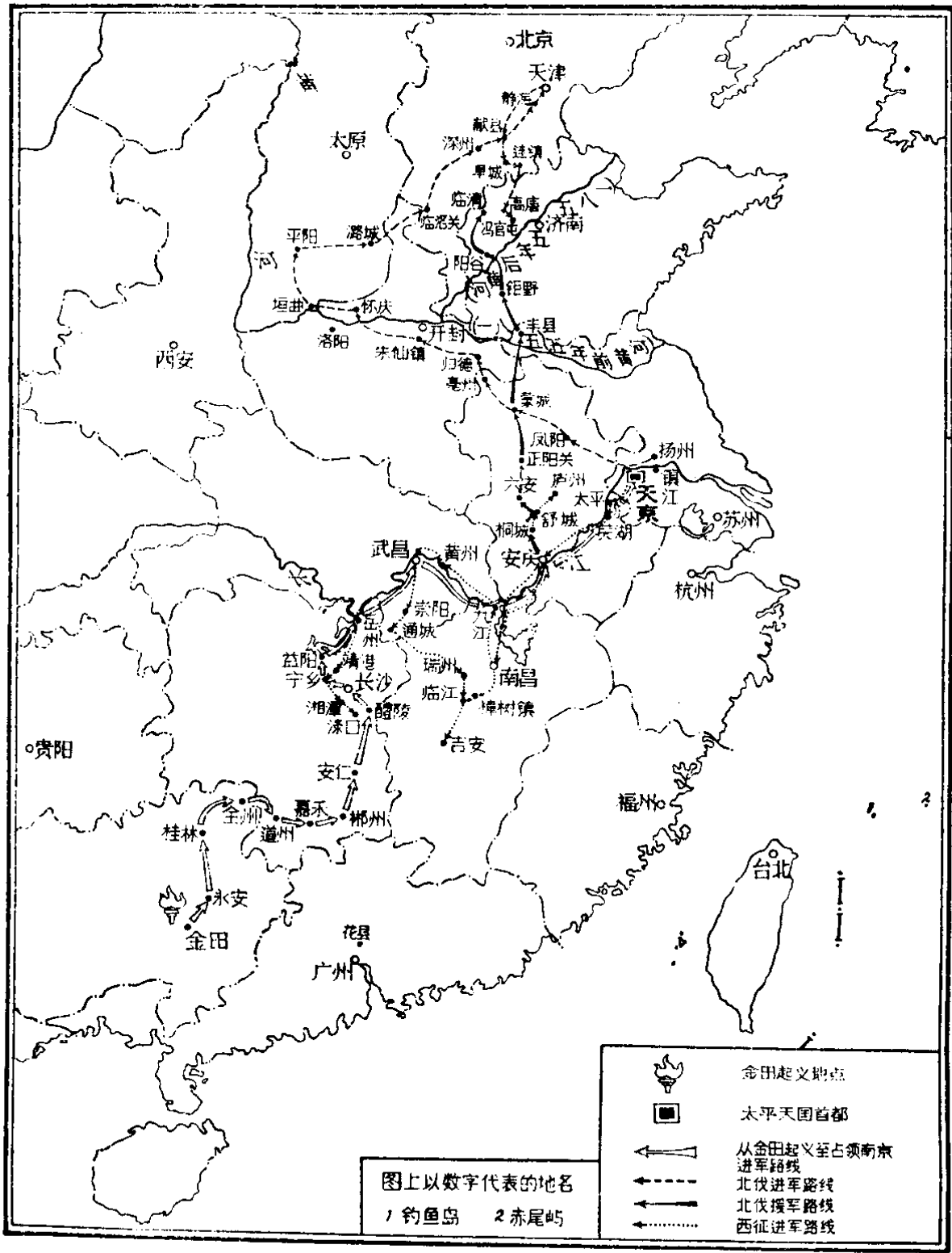
拜上帝会革命势力，和当地反动势力的斗争，尖锐起来。武宣有个地主在地方办团练，对拜上帝会恨之入骨。一八四七年冬，他逮捕了冯云山，后来冯云山被群众夺了回来。这个家伙不肯罢休，又在一八四八年初再次逮捕冯云山，向桂平县衙门控告冯云山，“以邪教惑众，践踏神明”，“聚众谋反”的罪名，把冯云山关进监狱。冯云山被捕，对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带来很大不利。洪秀全得知后，立即从贵县赶回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受到突然袭击，会中没有了主持人。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出来假托“天父”下凡，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后来，萧朝贵也假托“天兄”耶稣下凡。“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杨秀清的代“天父”立言，虽然适应了那时的要求，维系了拜上帝会组织，但他把最大的权威拿到自己手里，给日后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埋下了危险的暗礁。杨秀清，广西桂平人，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以烧炭种山为生，也跑码头当运输工，他识字不多，但富有组织才能。萧朝贵，广西武宣县人，也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是一个勇敢刚强的斗士。经过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努力，拜上帝会得以继续发展。紫荆山的烧炭工人，凑了一笔钱，贿赂浔州知府和桂平知县，救出了冯云山。地主阶级企图用逮捕冯云山来削弱拜上帝会，结果适得其反，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至此，拜上帝会团结的革命群众中，逐步形成了以洪秀全

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在内的领导核心。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广西桂平县人,当地有名的地主,占地达二百四十多亩。韦昌辉的父亲捐了“监生”的头衔,监生只是一个低级的功名,但他却在门前高挂“成均进士”的大匾额,炫耀乡里。同村地主勾通官府以“僭(音见 jiàn)妄”的罪名告发他,重重敲了他一笔竹杠。韦昌辉怀恨在心,投入了拜上帝会。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出身地主家庭,因为是客家人,受土著地主排挤,在当地无法立足,也参加了拜上帝会。

领导核心形成后,就带领群众训练队伍,制造军器。到一八五〇年,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以紫荆山为中心,西至武宣,西南至贵县,东至平南、藤县,北至象州,南至博白、陆川及广东信宜等地,几乎每村都有拜上帝会的群众。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也有不少烧炭工、矿工、运输工和手工业者,这些无田可耕的破产农民,革命性很强,是革命力量的骨干。

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革命的条件成熟了。



太平天国前期革命形势图

三、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

一八五〇年六、七月开始，各地拜上帝会成员得到洪秀全的通知，陆续集中于紫荆山麓的金田村，称为“团营”。其中有石达开带领的贵县队伍，蒙得恩、莫仕葵带领的平南县队伍，赖九带领的陆川县队伍，黄文金等带领的博白县队伍，苏十九带领的桂平县队伍，秦日纲带领的贵县龙山矿工队伍，以及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客家人等，总共有一万余人。

各地会众不分男女老幼在金田村集中后，都按照规定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缴给“圣库”（公库），生活由圣库供给，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以适应那时的经济环境和战斗生活。

同时，编制营伍，分配军械、旗帜、被服等，分别扎营于犀（音西 xī）牛岭后琳窠（音豆 dòu）村一带，指挥部设在犀牛岭上。队伍分男营、女馆，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开始造成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太平军。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和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右军主将韦昌辉、左军主将石达开，以及秦日纲、胡以晃等，率全体战士，由营盘齐集韦氏

宗祠门前，举行隆重的仪式，洪秀全庄严地宣布起义，随即颁布简明军纪五条：

一、遵条命(服从天条和命令)；

二、别男行、女行(男女分营)；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惟(音挪 nuō)，各遵头目约束(公心即不私藏财物，和惟即和睦)；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战士们不盘辫子，蓄发易服，头包红巾，标志同清朝统治者的根本对抗，因而被污蔑为“长毛”。革命队伍浩浩荡荡从金田村出发，首战告捷，攻占了大湟江的重要市镇江口墟。

拜上帝会的革命旗帜在南中国的上空升起来后，天地会(反清秘密结社)首领洪大全来投洪秀全，表示合作。洪大全，湖南人，原名焦亮，读书出身，多年游历湖南、两广各地，广结会党，是一个欲图大事的人。还有罗大纲、苏三娘等多起起义队伍，也加入了太平军。由于天地会和拜上帝会的信仰有所不同，组织纪律也比较松弛，因此有些头目随后又脱离太平军他去。而罗大纲、苏三娘对太平军却坚信不渝，罗大纲后来屡立战功，成为太平军的名将。

随后，洪秀全宣布建国，号为太平天国，自己为太平天国天王，以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军师是太平天国仅次于天王的重要职位。

清朝政府被广西的革命烽火吓慌了，急忙调派军政大员，

以向荣为广西提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并任命李星沅为钦差大臣，调湖南、贵州、云南等省军队围攻。太平军不但没有被围住，反而由江口墟转战武宣，连败清军。清朝政府得报，加派大学士赛尚阿统率都统巴德清等，拨银二百万两充军饷，驰往广西部署军事；又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领军赴援。李星沅在武宣病死，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五月，太平军驰驱象州，为了粉碎清军的包围，从象州转攻桂平，又从桂平冲破围攻，在平南大败向荣部队。向荣狼狈逃命，军器锅帐统统丢光。九月二十五日，太平军陆路先锋罗大纲占领永安城。这是从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洪秀全在永安发布诏令，申明军纪，告诫各营战士“各宜为公莫为私”，一切缴获应上交圣库。洪秀全还派人下乡宣讲太平天国的政策：天兵入境，专为杀妖，希望百姓各安生业，凡愿参加太平军的，有吃有穿。太平军在永安狠狠打击地主阶级，没收地主的浮财，勒令地主捐献钱粮，如有抗拒，就发动群众抄他的家，“出谷子，抬肥猪”，还号召农民不向地主交租。

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组织政权机构。洪秀全分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都受东王节制。其余秦日纲、胡以晃、罗大纲等，都按新定官制，分别授予丞相、总制、军帅、师帅等职。这样，就逐步组成了革命的领导机构。

在永安还颁行了太平天国自己的年历，称“天历”。天历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虽同地球

绕太阳一周为三百六十五日又约四分之一日有点差错，但它否定了清朝的纪年，删除了旧历书上的生、克、吉、凶等迷信内容，此后行使于太平天国辖区，在政治和思想上具有重要意义。

清军分南、北两路向永安围攻，封锁经济，满想把太平天国这个新生的政权，扼杀于永安山城中。

一八五二年四月初，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东趋古苏冲，攻破扼守古苏冲的清军，踏营盘而过。清军南路统帅乌兰泰率兵追入古苏冲，太平军的后队遭到袭击，受了损失，洪大全被俘。清军把洪大全看作太平军的重要首领，押送北京杀害。

古苏冲离永安城二十里，再深入十五里，为悬崖峭壁的龙寮(音辽 liáo)岭山区，过岭为大洞山。太平军受到古苏冲的教训，在大洞山埋伏了重兵。乌兰泰得意忘形，跟踪追来，陷入重围。伏兵从两路冲出，挥刀乱砍，当时雾雨交作，路隘泥滑，清军进退不得，乱作一团，死伤累累。四个总兵和参将以下将官多名，一齐送了命，乌兰泰也被杀得滚下了崖涧。太平军乘胜向桂林挺进，向荣连忙退军桂林城内，乌兰泰收拾残兵败将，赶到南门外的将军桥顽抗，中炮重伤，临死前悔恨地奏陈清朝皇帝说：“奴才不善用兵。”

太平军急攻桂林不下，撤围北进，经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城内的飞炮击中，受了伤。太平军于六月三日攻破全州，对清军和州官进行了严惩。两日后，退出全州，照原定计划向湖南进军，刚到离全州不远的箕(音梭 suō)衣渡(是由全州进入

湘南滩险水急的要道),遭到江忠源所率楚勇的伏击。冯云山因伤势过重,在这里逝世,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清军的阻击阻止不了太平军的攻势,就在蓑衣渡战役后两天(六月十二日),太平军攻下了湘南的道州,进行整补。太平军以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右辅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先后发布了《奉天讨胡檄(音系 xi)布四方谕》《奉天讨胡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等三篇檄文,声讨清朝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清朝。

这三篇檄文指出:

一、太平天国是奉天命行事。

二、菩萨偶像、阎罗妖和清朝统治者一样,都是魔鬼。这些魔鬼是人民的公敌,人民应该“速即反戈,替天诛妖”。

三、清朝政府罪恶滔天,“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罄(音庆 qìng)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音聂 niè)”。

四、警告各地团练赶快醒悟,希望各省英雄豪杰,“各各起义,大振旌(音京 jīng)旗”,要三合会党(天地会)和太平天国一起,“同心同力以灭清”。

这三篇檄文,除去宗教色彩,通篇贯串着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爱憎分明,文字犀利,有力地揭露、批判了清朝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罪恶,在从湖南到南京的进军途中,鼓舞了千百万群众的斗志。

太平军驻道州两个月,分兵攻克江华、永明,天地会和其

他劳动群众两万人加入太平军队伍，建立了道州大旗。然后离开道州，连克嘉禾、兰山、桂阳等地，在会党的响应下，打退清军的顽抗。八月十七日攻下郴(音琛 chēn)州，焚毁了郴州的学宫和孔子牌位，革命声势大张，又有两三万群众编入革命队伍。至此，太平军连同广西的老兄弟，已扩充至近十万人，其中在道州、郴州一带加入的挖煤工，成为以后掘地道、轰城墙的有力队伍。

太平军攻占郴州后，前军主将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等，领兵两千多人，一路战斗，经永兴、安仁、攸(音优 yōu)县、茶陵、醴(音李 lì)陵等州县，疾趋长沙，九月十一日到达长沙郊外，展开了攻城战。萧朝贵身先士卒，骑马挥刀往来指挥，不幸在长沙城下中炮牺牲。李开芳骑马飞驰到郴州报告洪秀全。洪秀全大怒，率领全队围长沙，命令挖地道攻城，经过几场激烈的战斗，攻城不下。十二月，太平军绕过长沙，攻克益阳，几千船民参军，成为太平军水师的基本力量。接着轻取岳州，占领汉阳。为了进攻武昌，太平军造了一座从汉阳晴川阁到武昌汉阳门之间横跨长江的浮桥。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以地雷轰破武昌文昌门城墙，八名战士高举旗帜跃登城墙，部队象潮水般地冲上来，占领了武昌。太平天国在武昌设圣库，设男馆、女馆，有病的送入能人馆，派医生治疗，每日分发米盐。太平军勒令地主官僚向太平天国交金银财物，还在城内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武昌是太平天国攻下的第一座省城，影响很大。地主阶级总头目咸丰皇帝，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发出了“吃睡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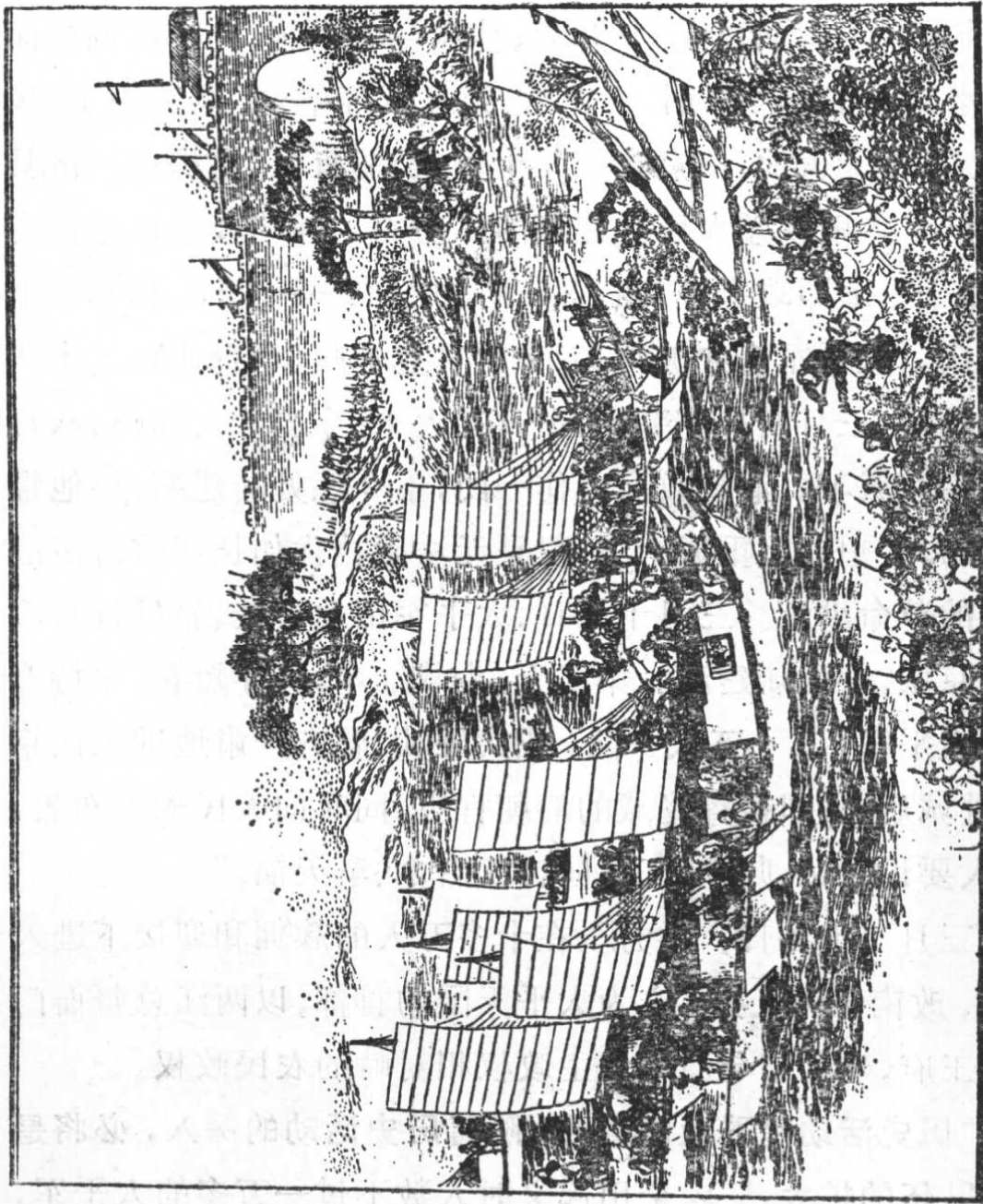
的哀鸣，急命两江总督陆建瀛(音营 yíng)为钦差大臣，督兵进防江苏、安徽，企图堵截太平军，挽回节节败退的危局。

一八五三年二月，洪秀全指挥五十万大军，水陆两路东下。陆路大军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夹长江两岸而行，水路大军由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下，风帆旌旗，漫天盖地，前后连接几十里，长驱直入。在鄂东广济县老鼠峡，大败钦差大臣陆建瀛的江防军，陆建瀛慌忙逃往南京，太平军随即攻克皖、赣、鄂三省的门户——九江，和军事重镇安庆。太平军势如破竹，二十六日克池州(今贵池)，二十八日克铜陵，三月四日克芜湖，七日克太平(今当涂)、和州，八日兵临南京城下。清朝政府慌作一团，下令惩处陆建瀛，要他带罪立功，妄想以此重振士气，但是无法阻挡犹如长江波涛滚滚而下的革命洪流。三月十九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仪凤门，攻破南京城，杀死陆建瀛。第二天，头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持刀矛的太平军，二十五人一队，威武雄壮、整齐严肃地进入南京城。进城后，立即搜查隐藏的清朝官吏，同时向人民颁布布告：“人人要识天父，归顺天王，同打江山，共享天福。”

三月二十九日，洪秀全在十多万人的簇拥和迎接下进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建立了与清朝地主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 金田起义时人数不过一万多的太平军，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〇四页。



洪秀全指挥五十万大军，水陆两路沿江东下

从广西打到南京，队伍大为发展，号称一百万。太平军的节节胜利，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太平天国创造了一套崭新的制度，来组织自己的队伍。作战部队以“军”为单位，每一军有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由军帅统领，下分前、后、左、右、中五师；每一师有二千六百二十五人，由师帅统领，下分前、后、左、右、中五旅；每一旅有五百二十五人，由旅帅统领，下分一、二、三、四、五五卒；每卒有一百零四人，由卒长统领，下分东、西、南、北四两司马；每两司马统领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五人。太平军编制整齐，军容壮观，密林似的长矛，嘹亮的军号，构成为一幅生气勃勃的图景。这支军队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旺盛的战斗意志，使敌人闻风丧胆。

太平军集中手工业工匠编成诸匠营，负责军需生产。妇女大多直接参战，不能作战的编入女馆，负责后勤工作。太平军中，老、幼称为“牌尾”，老年人只作削竹签（用于插置城壕战地，以障碍敌人）、烧饭等工作；儿童组成童子兵，协助成人作战，往往发挥令人惊叹的勇敢和机智。太平军使每个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发挥自己的作用，各部分工作都能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灵活的战斗集体。

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在行军作战中，屡次颁布营规、军纪，强调服从指挥，爱护群众，保护武器，缴获归公等注意事项。所以，从金田起义到占领南京，太平军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各地农民起义的蓬勃兴起。福建有小刀会起义和红钱会起义，上海有小刀会起义，广东有天地会起义，广西有“昇平天国”起义，江西有天地会起义，安徽、河南有捻军起义，声势都很大，使清朝反动统治陷入了风声鹤唳、顾此失彼的困境。

太平天国和各地革命力量互相激荡，形成了震动全国的革命高潮。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密切注视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在一八五三年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热情洋溢地歌颂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运动。马克思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① 马克思热情地关心中国的革命，并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给予高度评价。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在当时世界上引起了反响。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〇九页。

四、建都后的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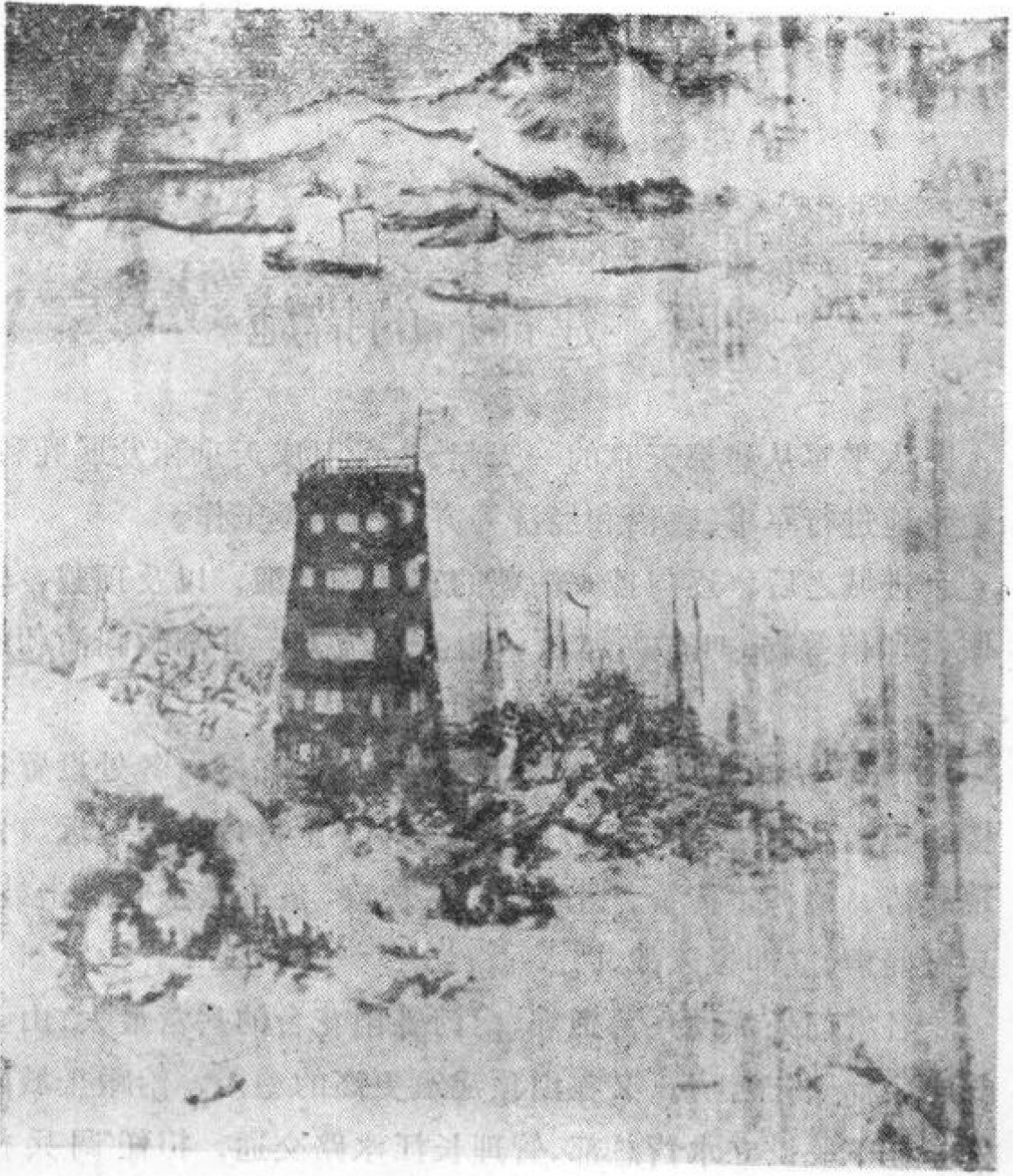
太平军从建都天京的一天起，为了卫戍天京和发展胜利，紧张地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进城之后，逐户搜查清朝的官兵和奸细，以及顶戴、靴服、印信等物，叫做“搜妖”，以安定地方，并割断同清朝的关系。

修葺(音戚 qì) 城门、城墙，浚深城壕，在城内各处设置望楼。望楼高五丈，分三层，每层设梯，登上可以瞭望远近。发现敌情，就挥旗传警，遇敌人大队来攻，就在楼上吹螺击鼓，兵民闻声，立即投入战斗。

各城门外都设兵营把守，南门外雨花台的兵营最大，山上的庙宇都圈作营房，又在山顶建筑更高的望楼，俯瞰全城内外。在下关设立水营总部，管理长江水路交通，担任调兵往来、运输接济和传递文报等任务。这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坚持战斗的重要保障。

在周密实施城防计划、准备打击来犯之敌的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把从起义以来在军队中实行的一套制度，在天京的城厢内外推广开来。按照军队中严格区分“男行、女行”的



天京的望楼

规定,青壮年男子称为“牌面”,编入营伍。那时一个留在天京尚未逃跑的地主阶级诗人金和写了一首诗,说就在三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后的几天之内,“令人占口籍(下令登记名册),书年与名姓。老年可从略,意在壮者劲。大半署为兵,加

‘伪’号曰圣。”就是说，丁壮的大半都被编为“圣兵”。大半之外的丁壮，是按职业技能和根据需要，分别编入各匠营和各种典衙机构，从事生产劳动。老弱男子编入牌尾馆，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如清扫街道、夜晚打更及其他辅助性工作。

妇女除善于织绣的编入女绣锦营外，其余一律编入女营。女绣锦营的性质与诸匠营相同，也是在政府组织下从事专业生产。女营也称女馆，以担负普通的体力劳动为主，不同于专业作战的女军。所做工作，有协助收获、运输粮盐、挖壕沟、削竹签等。

男女分营很严格，虽夫妻也不许私自过从。这主要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借以严密革命组织，保持旺盛的战斗。所以，杨秀清在诰谕天京居民时说：“分为男行、女行”，“不过暂时分离，将来罪隶（指清朝统治者）诛锄，仍然完聚”。

太平军在起义之初早已实行的圣库制度，对严肃军纪、保障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制度到天京又有所发展，设置总管公有财产的“天朝圣库”，不仅一切征收和缴获统归圣库，并明令宣布：“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随即把私有的房产、金银、粮食、货物等，一律收归公有，贵重物品缴入天朝圣库，日常物品分别设立堆栈收藏和委派典官经管。

对于供给，作了具体规定。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钱，只是吃肉有别。每逢礼拜日，各官开单领取“礼拜钱”和粮食、油、盐等物品，官员每人每七日领钱一百文，士兵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日给米二百斤，油、盐各七斤。原则上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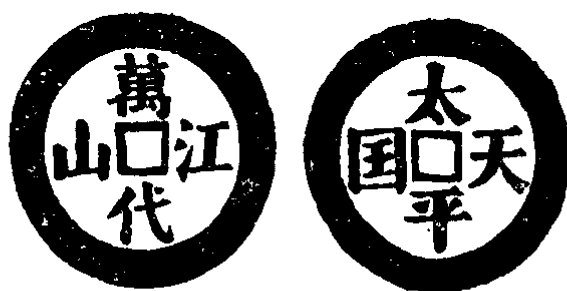
天王到士兵都不准私蓄财产，一切全由公家供给，兵民都一样。一八五四年一个访问天京的外国人，在《天京见闻录》中这样描写道：“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人民所穿的衣服都很好，米粮丰富，足食有余。”但圣库制度后来遭到破坏，事实上这种绝对平均的办法，也是很难长期施行下去的。

太平天国对各项手工业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设立诸匠营和典官，分类集中生产资料和工匠，进行生产。天京诸匠营，可考者有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音捐 juān）刻营等七种。土营最初专门担负挖地道攻城的工作，后来把泥水匠编入，又包括了建筑工程的任务。木营担负制造木器和建筑工作。金匠营打造金、银器皿。织营织造布、缎。金靴营制造靴鞋。绣锦营担负刺绣和各类用品上的绘画。镌刻营刻印诏旨、书籍、印玺（音喜 xǐ）。

典官大略分为两种：一种是专管采办、保管、分配等工作的，如典圣库、典圣粮等；另一种是兼管生产和分配工作的，如典铁匠、典铜匠、典茶心等。典官机构叫做“衙”，种类繁多，分工很细，仅制造食品一类，就有舂碾粮食的舂人衙，宰割牲畜的宰夫衙，制造豆腐的豆腐衙，制造酱品、作料、小菜的酱人衙，制造糕饼的茶心衙，制造茶叶的天茶衙等等，所以通称为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是同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这样有组织地集中生产，在那时是富有创造性的设施。连太平天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但是，把各行各业全部统制起来，产

品主要归官兵消费，完全脱离市场的供求关系，日子久了，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生产者的积极性，变为发展生产的阻力。

太平天国还一度废除商业，理由是“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施行了一个短时期，便取消了这种对商业的禁令，改为由国家经营管制的政策。凡商人愿意开业的，禀告佐天侯陈承镕发给执照，到圣库领取资本，



太平天国的钱币

经营货物和利润都有限制。他们在天京北门外设肆，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等业。这个办法实行了几个月，还是行不通，各店纷纷歇业。但是在天京城外，却允许自由买卖，城内太平军也到这里来购买东西。其他所辖境内，商人领取“商凭”，照旧自由贸易，税额较轻，许多城镇出现了百货流通、万商云集的繁荣景象。

太平天国在推行各项军政经济设施的基础上，要求建立一个理想的“天国”，一八五三年冬颁布了改造社会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长期以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土地为公有，然后分配给农民耕种；二是建设基层政权——乡官制度，以此构成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原来的社会结构。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耕地按照农户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分田的办法，是把土地分为九等，一亩早晚两熟，产量一千二百斤为上上田，产量减一百斤降低一等，年产四百斤为下下田。不分男女，十六岁以上受田，十五岁以下减半。“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

但是，也必须指出，它的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规定，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它规定“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农民分得土地后，保持每家有几亩地、几株桑树、五只母鸡、两口猪等，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农民每年收获所得，除生活必需外，一律归公，缴入国库；如有婚娶吉喜等事，一概由国库开支，幻想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财产。这种美好的设想，固然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摆脱贫困，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的愿望，但它毕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设想。毛主席说过：“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

的。”^①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从农民的主观要求出发，提出带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纲领，是可以理解的。

太平天国宣布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皇上帝”所有，把土地看作公有，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是想把土地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回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普遍要求，实际上是一种“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无疑具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在中国资本主义已面临诞生的年代里，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烈刺激下，不管太平天国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太平天国革命客观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天朝田亩制度》的制订，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历史趋势。

这个土地纲领，不管是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还是由于实行有困难，总之没有付之实施，甚至后来太平天国的文献，也没有再提到它。但是由于农民战争反封建的实质，和这一土地纲领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太平天国的实际斗争中，《天朝田亩制度》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冲击和破坏，仍然是很大的。它表现于以下这些事实：一、把清朝政府各级官员呼为“妖头”，给予严厉处分，对于负隅顽抗的团练头目，更是无情镇压，这种措施，不仅清除了一部分封建政治势力，也迫使更多的地主分子向上海和其他地方逃亡，大量土地自然地归于农民；许多庙宇被毁后，它的田产也落到农民手里。所以，扬州就出现了“三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〇九页。

年贡赋未输租”的情况，即只向太平天国纳赋，不向地主交租；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也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二、在天京附近的有些农村中，佃农可以不再向地主交租，只给革命政权纳赋，这就承认了佃农对租田的所有权；在其他地方，也有太平天国乡官发给佃农“田凭”后，不许地主“挂名收租”，从法律上否定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地主们看到“丰年景象，未免垂涎”，哀叹“租米不收，于我无分”。这种情况虽然仅限于局部地区，但对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具有深刻的意义。三、在好些地方，强迫减低租额，有减租百分之五十的；有每亩地只交租二三斗、四五斗的；也有地主向佃户收租，佃户愿意给就给一点，不愿意给就根本不予理睬的；更有在减租之后，要地主把所收到地租的大部分，作为田赋和各种费用上交太平天国的。至于用“打先锋”、“进贡”、“大捐”等名目，勒令地主交出粮食和金银一类浮财，则是打击地主阶级经常采用的方式。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把太平军的“军”的编制单位，作为地方基层政权。规定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军帅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管五个伍长，伍长连同自家在内管五家，以此上推，军帅治下共有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当兵。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相当于村。在这里设国库一，婚娶吉喜等事，照定额由国库供

给，鰥(音官 guān) 寡孤独废疾也由国库给养；设礼拜堂一，进行宣道和教育儿童；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逐级上达，设计成为一个严密的、理想的社会组织。

这个社会组织方案，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作为基层政权的乡官制度，是推行了的。在建都天京后，太平军每定一地，就命令州县编造户册，各就本乡推举军帅以下乡官，执行征调和政教等任务。乡官由推举产生，是一项具有民主精神的措施。如安徽潜山县，就产生了六个军帅、十八个师帅、七十二个旅



《天朝田亩制度》

帅等。军以上是县，派监军治理；县以上是郡（府的改称），派总制主持，称为守土官。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根据“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的理论，主张男女平等。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作了两条重要规定：一条是“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显示男女经济地位平等；另一条是“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由于妇女受到重视，所以太平军内有女军，天朝内有女官，女营的妇女参加各项生产劳动，都表现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一个外国人在访问天京后写道：“在街上行走时，所见到妇女在路上者之众多，确是一种新现象。她们衣服装饰大都甚好，其外观十分可敬。许多骑马往来驰骋于路上，其他则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大脚的。有些驻足倾听我们传道，而举止端庄，其礼法仪注，完全合度。比较旧制度、旧礼教，这是新的现象。”可见，太平天国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是它反对封建束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乘胜攻占了军事重镇镇江和扬州。为了抵挡太平军的攻势，太平军的死对头向荣赶到天京城东的孝陵卫驻营，建立“江南大营”。清朝政府又派琦善等领大军驻扎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针对这种形势，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天京严密设防的同时，制订了北取北京，西征皖赣等省的军事计划。

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决定直捣清朝的老巢，出师北伐。临行前，洪秀全对北伐军规定的作战方针是：大军要乘虚而入，疾趋北京，不要贪图攻城夺地，推延时日。以李开芳、林凤祥两员猛将为首的精锐部队约两万人（一说几万人），从扬州出发，破临淮关，一路攻克凤阳、怀远、蒙城等城。吉文元、朱锡琨等相继领兵北上，与李开芳、林凤祥部在亳（音薄 bò）州等地会合，进入河南。这一带是捻军最活跃的地区，北伐军和捻军互相配合，使清军顾东失西，连吃败仗，群众纷纷加入北伐军。六月，打败河南的反革命军队，攻下归德。

李开芳、林凤祥等计议从归德的刘家口渡河，进军山东，直扑北京。因清军在河南、山东、江苏三省黄河渡口，处处严

防，把渡船撤到北岸，封锁黄河。北伐军在这里渡河不成，就沿黄河南岸（今陇海线）西进，连克宁陵、睢（音虽 suī）州、杞（音起 qǐ）县，经陈留、直抵开封，急攻开封不下，驻军朱仙镇略作休整。李开芳、林凤祥曾派人回天京报告沿途进军情况说，到此后“亦无船只”，“粮料甚难”，“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反映了北伐军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困难丝毫动摇不了英雄们进军的决心。北伐军由朱仙镇继续西进，经中牟、郑州、荥（音形 xíng）阳至汜（音寺 sì）水、巩县。在巩县洛河口，终于搜寻到运煤船多艘，大队得以渡过河去，后队因清军追上，未能尽渡。

清朝统治者满以为黄河天险，太平军断难飞渡。不料太平军于六月下旬由洛河进入黄河，飞渡天险，进围怀庆（今沁阳）。怀庆是河南北部的重镇，清朝政府见太平军包围怀庆，慌了手脚，连忙派直隶总督讷（音呐 nè）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统辖黄河南北各路清军抵挡。北伐军围怀庆五十多天，多次挖地道攻城不下，损失较大，便于九月一日撤围。清朝政府见怀庆解围，得意忘形，赏讷尔经额黄马褂、双眼花翎（音铃 líng）。清军正在庆功行赏的时候，太平军抄太行山小路挺进山西，连续攻破垣曲、绛县、平阳、洪洞，经岳阳、沁源、长子，续克潞城、黎城，九月二十九日攻占直隶、河南交界的险要地——临洛关，进军直隶。咸丰皇帝气得把讷尔经额革职拿问，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赏赐“神雀刀”，为他打气。然而胜保却是一个“败保”，只知尾随北伐军奔跑，专打败仗，北伐军曾在路边树立木牌，写上“胜保免送”几个大字，讽刺这个常败将军。

十月，北伐军乘胜北上，攻下沙河、任县、赵州、栾城、深州等地，前锋迫近保定，北京震动。咸丰皇帝惊慌失措，使出最后一招，派皇叔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带领驻北京的军队和从东北调来的军队，会同胜保“合力抗拒”，严防保定、涿（音桌 zhuō）州一带，北京设立了巡防所，宣布戒严。皇帝成了惊弓之鸟，做好了逃往热河“行宫”的准备，北京城内的官僚地主纷纷外逃，达三万多家。

由于清军愈聚愈多，迎头拦截，北伐军从正面进军发生困难，便改变路线，由献县折向东南交河、泊头镇，然后北攻沧州、青县，直指天津，十月底向天津发动了攻击。这里离北京只二百数十里，是北伐军到达的最远战地。这时天津防守已严，追兵又陆续赶到，北伐军扼守独流、静海，坚持战斗，终因力量悬殊，又届严冬，缺衣缺食，渐入困境。一八五四年二月初，北伐军主动南撤，三月退占阜城，等待天京援军。

但是，援军已经无望了。原来，天京多次接到北伐军的请援报告，一八五四年二月派黄生才等领兵北援。黄生才等由安庆出发，一路奋战，攻至山东金乡。由扬州来援的曾立昌部，也赶到山东汇合，又连续打下钜野、郟城、冠县等地，四月十二日攻入临清。临清离阜城只有二百余里。援军继续西进，却被胜保等重兵截回，只好撤出临清南退，从此与待援的北伐军相去日远。在南退途中，援军遭到追击堵截，几乎全部损失。

北伐军在阜城战斗了一个多月，吉文元英勇牺牲。五月初，北伐军猛战三日三夜，全师冲出重围，退守河北南部的连

镇。进镇后，迅速布置防务，还有近万人。李开芳、林凤祥不知援军已败，想同援军联络上，由李开芳分军突围，经德州南走，转战恩县，于五月底占据了山东高唐州。北伐军就被分隔包围了。

林凤祥在连镇，严守待援，不断地击退清军的进攻。一八五五年二月，西连镇陷落。饥饿疲惫的英雄们，仍在东连镇坚持战斗两个月，三月七日东连镇又被攻陷。林凤祥手执大刀，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不幸手臂中箭，刀落被俘。三月十五日，林凤祥在北京被杀害。在遭受“寸磔”（音哲zhé）的酷刑时，林凤祥英勇顽强，“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连镇陷落，高唐依然坚守。清朝政府见胜保无用，下令把他抓到北京治罪，由僧格林沁移军进攻。三月十七日，李开芳率八百多人突围，退至茌（音迟chí）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引河水灌冯官屯。相持至五月底，北伐军最后的八十余人，被僧格林沁解送北京杀害，结束了北伐军的悲壮历程。

北伐军驰驱六省，转战五千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但由于太平天国领导者战略上的错误，没有充分认识到必须一鼓作气地推翻清朝中央政府，扫荡中原，却只派一支力量单薄的北伐军孤军深入，派去的援军又被挡住，因而陷于失败。这样就失去了乘胜直捣北京的大好时机，使清朝政府得以稳住阵脚，重整旗鼓，实行反扑。

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开始了沿长江而上的西征。一八五三年五月，胡以晃、赖汉英、石贞祥等率领战船一千多艘，浩浩荡荡出发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夺取安庆、九江、武

昌这三大军事据点，控制上游，屏障天京，切断清朝中央政府与长江以南的联系，一举奠定江南。

西征军进展很快，六月攻下安庆，接着占领江西的湖口和南康，进围南昌。洪秀全派石达开赴安徽治理新占领的地区。石达开到安庆，对地主阶级百般笼络，选择村里有“声望”的地主担任乡官，照旧制征收田赋和商税，使地主、商人“各安其业”。石达开的做法，博得了地主阶级的喝采，因而“颂声大起”，地主阶级吹捧他“通文墨，重文人”，“性较和平”。

九月，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出湖口，占九江，派林启容长期据守，以沟通长江上下游。石贞祥等率大军扬帆上驶，占领田家镇和半壁山要地，控制江面。十月，接连攻下黄州和汉口、汉阳，后来因为力量准备不充分，退守黄州，整军待援。

为了巩固安庆、经略皖北，十月胡以晃、曾天养挥军攻下集贤关，十一月又连克桐城和舒城。督办安徽团练的在籍工部侍郎吕贤基吓破了胆，投水自杀。十二月，胡以晃、曾天养率大军进攻庐州（今合肥），连营四百里，阻击各路援敌，于第二年一月攻克庐州。刚以战“功”升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也和吕贤基一样投水自杀。

不久，黄再兴、曾天养等军，由下游开到黄州，与石贞祥会合。一八五四年二月，大败清军于黄州外围的堵城，乘胜三占汉阳，包围武昌（随后攻下武昌）。三月，分军进攻湖南，连克岳州、湘阴等地。西征军进入湖南后，碰到了一个新的凶恶敌人曾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的大地主、清朝礼部侍郎，一八五三年

居丧在家。那时，咸丰皇帝看到八旗、绿营所至溃败，全不是太平军的敌手，为了挽回败局，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官僚地主举办团练。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死硬派、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怀着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这个家伙受命在湖南办团练后，就着手拼凑湘军的黑班底。湘军的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声称愿为保卫“圣朝”、“伦常”而死战，都是一些顽固的封建儒生。曾国藩用封建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来控制他的军队，士兵由营官自己招收，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造成一种浓厚的封建隶属关系，结成反革命的死党。曾国藩编的团练，首先镇压当地农民，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者杖毙，轻者鞭责。短短几十天中，屠杀农民二百多人，一时怨声四起，怒骂曾国藩为“曾剃头”。一八五四年三月，湘军水陆两军练成，全军共一万七千多人，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团练，成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反革命军阀集团。

湘军倾巢出动时，曾国藩抛出了一篇名为《讨粤匪檄》的反革命黑文，表示他对革命的刻骨仇恨，狂呼由于革命，地主不能取租纳赋，商人不能做生意赚钱，士大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阴间），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竭力鼓动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起来对抗太平天国革命。

一八五四年四月，曾国藩带领湘军进犯岳州，准备东下，太平军给湘军当头一棒，打得他逃回了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攻占靖港、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四月二十八日，曾国

藩为了解除长沙北面的威胁，亲自出马，窜犯靖港。太平军用炮火猛烈轰击湘军水师船只，打得湘军水师船只在江中团团乱转，前进不得。太平军又派出一队战士斩断他们的纜绳，湘军水师顿时大乱。陆路湘军在太平军的打击下，纷纷争上浮桥逃命。曾国藩树立令旗，下令：“过旗者斩！”但湘军士卒已无斗志，那里还顾得上遵守军纪，都争先恐后地从旗旁绕过，向后狂奔。

这一仗，湘军差点全军覆没。曾国藩羞愤交加，跳水寻死，被随从捞起。由于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兵力太少，没有把这支新起的反革命武装一举歼灭，这样就给了曾国藩一个喘息的机会。曾国藩利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重造战船，再募士兵，准备反扑。

这年七月底，湘军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在反攻岳州的战斗中，太平军勇猛的老将曾天养，在城陵矶痛打湘军，歼敌数百，击毁击沉船舰三十多艘。后又与清朝湖北提督塔齐布交战。塔齐布是湘军一员悍将，但和曾天养交手时，却一筹莫展。湘军正在准备败退，一颗流弹打中了曾天养的胸膛，曾天养怒不可遏，大声呼喊着横冲直撞，杀伤敌人数十，举枪向塔齐布猛刺，不料刺在马上，自己从战马跌下，壮烈牺牲。

太平军受挫后，不得不退出湖南。曾国藩等分三路气势汹汹地向长江下游猛扑过来，一直打到了江西九江。曾国藩狂妄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情况是紧急的。洪秀全接连派石达开、胡以晃、罗大纲等



太平军在湖口击溃清军

率领援军，至长江抗击湘军，在鄱阳湖口打了一个大胜仗，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太平军到湖口后，采用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先是坚壁高垒不与决战，每夜派部队沿长江两岸擂动战鼓，向清军船只发射火箭，又派小艇到长江中向敌船抛掷火球，使敌军夜夜受到惊扰，不得安宁。一八五五年一月底，太平军故意撤开湖口守军，引诱敌军进入鄱阳湖，骄横的敌军乘一百多艘舢舨进入鄱阳湖，太平军立即把湖口水卡堵塞，使敌军分成了外江与内湖两段。太平军各个歼灭敌军，把停在长江里的敌军大船烧毁四十多艘。湘军大败，溃逃九江。罗大纲率领太平军水师逆流而上，追上了曾国藩的座船。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之后，太平军冲上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在一片混乱中逃上一只小船，又要寻死，他的喽罗把他拉住，逃回南昌。

太平军在湖口大捷后，乘胜反击，再度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进入江西，几个月内，攻占了七府一州五十余县，仅南昌、广信、饶州、赣州、南安五府还在清军手里。盘据省城南昌的曾国藩，在太平军包围之中，吓得坐立不安，哀叹“呼救无从”，“魂梦屡惊”。

这时，天京外围形势紧急，太平军不得不从西战场调回头来，歼灭围攻天京的敌军，使曾国藩松了口气。

六、打垮江北、江南大营

清朝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太平军刚建都天京时就摆开了架势，一个放在天京的江北，一个直逼天京城下，虽然近在咫尺，对太平天国却是奈何不得。但是，它们干扰太平天国的北伐和西征，长期纠缠于天京外围，进行种种策划和破坏，对天京的安全毕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江北大营，陆续拼凑的绿营和满蒙兵有一万七千人。统率这个大营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鸦片战争中投降卖国。帮办军务雷以诚，驻军扬州城外仙女庙一带，为了搜括军饷，采用策士钱江的建议，在当地施行厘金制，对商店按月抽税，对行商设卡抽税，名义上是按货值抽百分之一，各地随即仿行，给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提供了重要饷源。后来数十年，全国遍设厘卡，密如蛛网，成为一种压榨人民、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经常税制。

太平军从扬州出师北伐时，江北大营多次派兵追击，又乘太平军大军北去，扬州守军比较单薄，围困扬州。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底，太平军以城粮垂尽，从扬州撤退，城里的男女青壮年都跟太平军撤走，琦善得了一座空城。琦善在扬州撑持了

一年多，病死军中，由江宁将军讷明阿接替，在这前后，江北大营的清军曾经打到仪征，进犯瓜州，并串同江南大营的清军，窜扰镇江和浦口，给太平军添了不少麻烦。

江南大营是当时清军对抗天京的主力。向荣跟在太平军的背后，一路赶到长江，被升任为钦差大臣，统率这个大营；以背叛天地会、投降清军的张国樑，充当重要副手，拥有兵额两万人。这个向妖头（太平军对向荣的称呼）把大营摆在天京城外，满想打进天京去，今天扑向朝阳门，明天炮轰雨花台，可是太平军坚壁以待，使他无隙可乘。有时太平军也冲出城来，与清军激战一场。向荣每月却循例向咸丰皇帝奏报“战绩”，多次遭到咸丰皇帝的申斥，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上谕”说：“向荣抵军营以来，实在与贼接仗，仅止鍾山与七桥瓮（音翁去wèng）两处。嗣后叠次奏报，非言攻城之难，即铺张进攻之法，究竟多月以来，从未见一真实胜仗。”这年春上，天京城外的战斗沉寂下来，向荣紧张地和城里的反革命策划内应，幻想在碰壁之后借此取得“奇胜”。

天京城里的“内应”，为首的是两个对太平天国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个是上元廩生张继庚，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曾参预反动派的“保卫局”和“筹防局”工作，竭力抵抗太平军。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张继庚混入太平天国机构，潜伏下来，化名“叶芝发”，秘密串连反革命势力。另一个是江宁监生吴伟堂，也混入太平军队伍。他们刺探太平军的城防力量、军事部署及政治经济情况，收买内线，暗中和清军江南大营头目向荣勾结。几个月中，张继庚、吴伟堂连续写密信

给向荣，详告城内实况和攻城通路，约期发动。张继庚还溜出天京，亲自到向荣军营商定里应外合的事，多因日期差错或情况变化，没有搞成。天京一度发觉这一阴谋，捕杀了一些反革命分子，但抓不到“叶芝发”其人，也没有查出吴伟堂来。一八五四年二月中旬，一个知情的军帅识破了化名“叶芝发”的张继庚，才把他扭送卫国侯黄玉崑处。吴伟堂和张继庚的同党谋划更急，最后与向荣约定于三月二十一日夜从神策门攻城。届期清军爬伏城根，城内发出了接应的讯号，不料太平军已在通巷内增设大木栅，绕匝铁索，加以大锁，内应者下城拔栅，牢不可破。而守军惊起，吹角传警，内应者慌忙潜逃，清军也被轰走。天京立即清查内奸，严审张继庚。张继庚这个首恶分子，还想搅乱革命阵营，诬攀太平军的老兄弟，太平天国处死张继庚及其同伙，粉碎了天京内外敌人的诡计。这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胜利。

向荣的内应计划挫败后，仍然盯着天京不放，进行围攻，并分军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加紧围困镇江，又经常骚扰于天京和镇江之间，阻断沿江通路，使天京和镇江的接济发生困难。对此，太平军决定打一场激烈的破围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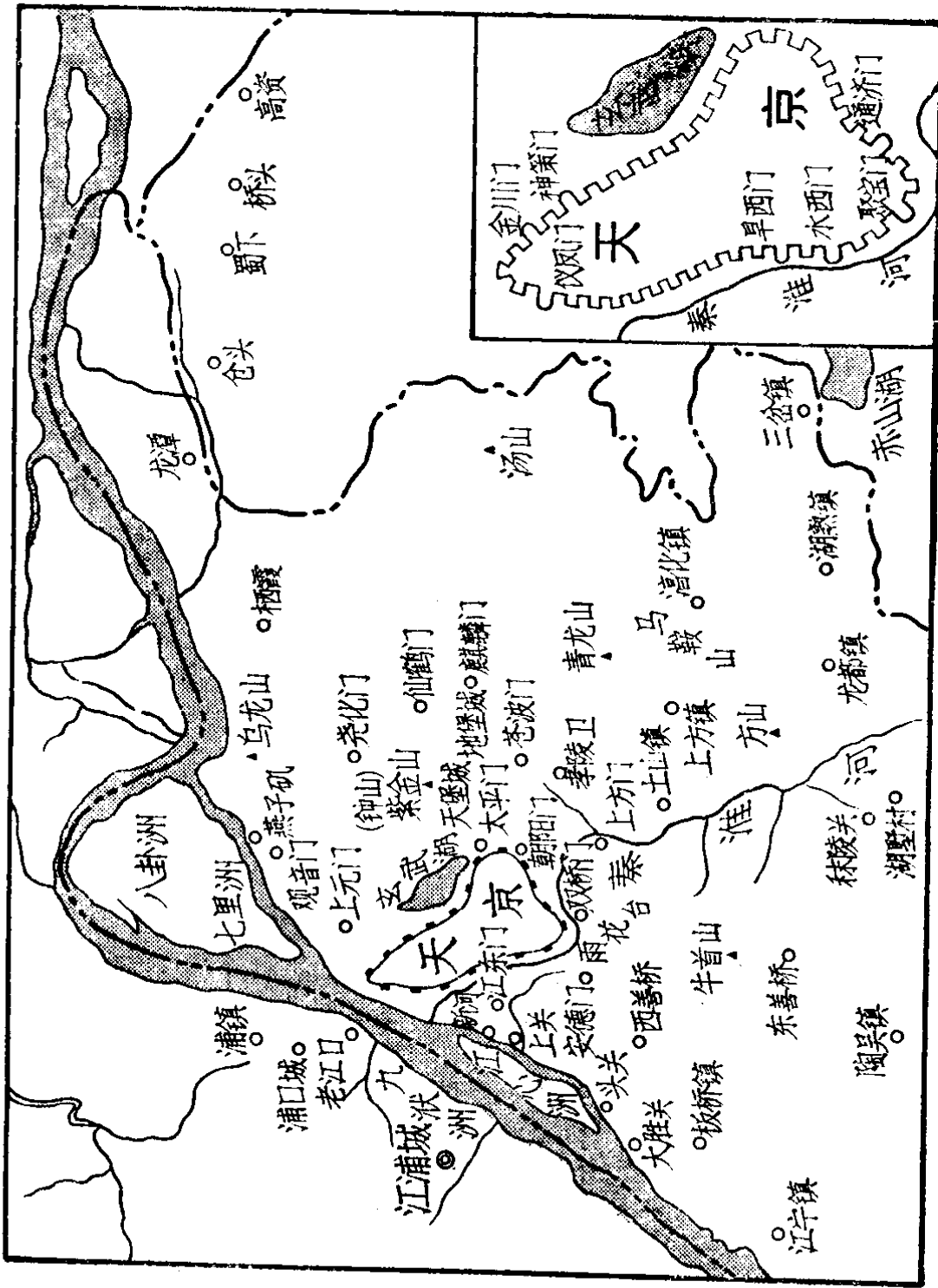
太平军对江北、江南两大营的破围战，是从镇江开始的。镇江是天京下游的屏障，在清军一八五五年的围困中，城内兵单粮少，吴如孝坚守待援，情况十分紧迫。一八五六年二月，燕王秦日纲奉命率领陈玉成、李秀成、周胜坤等自上游赴援，连破清营，指向镇江；为了夹击清军，派人入城联络。陈玉成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带领几名壮丁，坐一条轻捷的小船，从镇

江水关驶进，遭到清军水师炮船围攻，江上炮弹纷飞。陈玉成乘驾小船，冲出火网，一往直前，向城内驶去，和吴如孝联系上了。四月一日晨，秦日纲督率大军猛击清营，酣战至午，吴如孝、陈玉成从城内杀出，两下夹攻，大败清军，镇江之围得以解除。

秦日纲一到镇江，连夜调集船只，载运大军由金山渡江。四月三日拂晓到达北岸瓜洲，向扬州疾进，大败讷明阿于扬州土桥，连下虹桥、朴树湾、三汊河清营，江北大营一百二十余座营垒望风而溃。五日，太平军再次占领扬州，从扬州运粮接济镇江。太平军给江北清军以沉重打击，清朝皇帝气得把讷明阿等将领革职查办，改派副都统都兴阿为钦差大臣，收集江北溃军。秦日纲、陈玉成等从扬州转战浦口，五月下旬又从瓜洲挥师渡江，再攻南岸清军。六月初，连破镇江一带的清营七八十座，吉尔杭阿在溃败中举枪自杀（一说中炮丧命）。

太平军随着镇江和江北的胜利，按照原定计划，迅即在天京城外展开对江南大营的歼灭战。

向荣的江南大营，以孝陵卫为中心，沿着天京城东山地及城南秦淮河、石臼湖和固城湖建立营垒，形成一个北起石埠桥，南至溧水、东坝对天京的包围线。太平军对它发动了攻势：石达开奉命由江西率大军三万人分两路回天京，南路军经当涂，先于六月十三日进占溧水，溧水是苏、常地区的屏蔽，向荣立派精锐部队驰救溧水，清军大营的军事部署被扯动；秦日纲、李秀成等则于十四日由镇江战地率军返回天京，杨秀清严令他们移营尧化门、仙鹤门，从背后扼住孝陵卫清军大营；石达



天津形势图

开的北路军也于十八日从金柱关、大胜关赶到，在尧化门、仙鹤门一带筑垒数十，与陈玉成等军取得联络，并进军黄马群，截断孝陵卫清军大营通向仙鹤门、石埠桥的大道，进占溧水的南路军，也渐次逼近。至此，太平军对江南大营的围歼，已成关起门来打狗之势。二十日清晨，各路太平军全面出动，直扑清军营垒，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也纷纷由各门出击，鏖（音熬 āo）战终日，清军被打得狼奔豕突。入夜，清军各营火起，火箭射进了孝陵卫的清军大营，大营攻破了，清军兵将死的死，逃的逃，悍敌张国樑的左脚也中了一弹。向荣连夜率残军逃淳化，经句容，再逃丹阳，八月在丹阳忧惧而死（一说自缢），由张国樑代领残军，继续捣乱。

江南大营的溃败，解除了三年来清兵压城的威胁，还得到了大量军火物资补充天京，天京军民大为欢庆。

七、天京的变乱

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湖北、江西以及安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在扬州打败了江北大营，在镇江和天京击溃了江苏清军和江南大营，形势大好。从武汉到镇江的滚滚长江，船只往来，畅通无阻，成为太平天国东西呼应、南北配合的大动脉。但在这个时候，天国上空却出现了乌云，天京发生了变乱，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极为严重。

变乱的发生，起始于杨秀清专擅军政大权，破坏了领导体制。杨秀清在进入南京以后，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滥施威权。曾为燕王秦日纲的牧马对杨秀清的同庚叔（拜把兄弟的叔父）失礼小事，处死牧马，杖责秦日纲和对此事持合理态度的兴国侯陈承谿、卫国侯黄玉崑，黄玉崑愤极投水被救。还因事杖责过其他高级同僚。又常常借代天父立言的身份，打击洪秀全，甚至做出要杖责洪秀全的事来。这种上欺天王、下压首义有功将领的恶劣行为，给太平天国的领导关系造成了极不正常的现象。

混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却利用这些矛盾，进行别有用心的活动。他百般奉承杨秀清，只要杨

秀清的轿子一到，就三脚两步地跑出来扶轿迎接。同杨秀清谈不上几句，就跪在地下连声说：“非四兄（杨秀清称天父第四子）教导，小弟肚肠嫩（才识短浅的意思），几不知此。”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要韦昌辉对他的哥哥议罪，韦昌辉竟定了五马分尸的酷刑，讨好杨秀清，并说：“非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这种超越常情的谄媚恶态，表面上事事屈服于杨秀清的威势，骨子里却包藏祸心，等待时机，夺取权位。那时曾国藩的情报，就已经看出了韦昌辉对杨秀清，是“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

一八五六年八月，杨秀清以久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被击垮，悍敌向荣丧命，都是自己的功劳，权势欲更加膨胀起来，竟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忍无可忍，一面允于九月杨秀清生日（二十三日）加封，以便在时间上有所缓冲；一面急召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回京处理，以解决杨秀清威逼太甚的矛盾。

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带亲信部队三千余人赶回天京，以为时机已到，用迅切的手段包围了东王府，封锁所有通往东王府的街道。凌晨，韦昌辉和他的党羽闯入东王府，刺杀杨秀清，残杀其眷属和东王府大批人员。天明后，东王府内外尸首积塞，血肉模糊。洪秀全责备韦昌辉不应滥杀无辜，韦昌辉奸诈地表示愿受鞭刑的处分，诱骗杨秀清的部属去观看他“受刑”。他按照预谋，解除杨秀清部属的武装，又进行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自此日夜寻杀不已。两个多月时间里，两万多名太平天国的优秀将领和战士，在韦昌辉策划的变乱中牺牲了。

正在武昌洪山军营的石达开,得到消息,急忙起程,同部将数人,于九月中下旬赶到天京,面见天王得知详情后,对韦昌辉的行动表示异议,责他不应杀人太多。韦昌辉感到石达开也是他夺权的障碍,要杀石达开。石达开得知韦昌辉将对他也放过,就在当天夜间吊城从小南门逃出。韦昌辉果于深夜围住翼王府,找不到石达开,便杀了他的一家,并派兵追拿石达开。石达开跑到宁国,怀着仇恨,调集大军,准备讨伐韦昌辉。

韦昌辉篡据天京,布置城防,恐石达开凭藉城外报恩寺古塔为攻城堡垒,便先把这座古塔平毁。但是韦昌辉的暴行,早已激起天京广大官兵无比愤怒。在洪秀全的命令下,“各众内外,合朝同心”,抓住了韦昌辉及其追随者,处以死刑,然后将韦昌辉首级解往宁国石达开军营,要石达开回京辅政。祸根拔除,天京的残杀才平息下来。

杨秀清之死,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是洪秀全念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事后规定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九月二日)为“东升节”(意谓东王升天),以示纪念。还把他仅留的幼子袭封东王爵位。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到天京,合朝举他主持政务,天王也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回京,是怀有趁机擅权的野心的,洪秀全鉴于刚发生的变乱,对石达开存有戒心,在加封石达开的同时,还封了安、福二王,安王就是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福王是他的次兄洪仁达。石达开以自己受制于贪鄙的安、福二王,对洪秀全心怀不满,借口洪秀全“重生疑忌”,于一八五七年五月从天京出走,公然掀起了分裂

的旗帜。

石达开出走后，沿途张贴布告，向群众散布对洪秀全的不满情绪，蒙蔽广大官兵，把太平天国的精锐部队带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扩大了事变后的危难，使整个战局出现了不利形势。

武昌在石达开带兵回京后失守，江西大部分地区也被敌人攻陷，一八五八年五月，湘军又攻破鄂、豫、皖的咽喉九江，从上游向安庆进逼。清军并重建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钦差大臣和春为首的江南大营，于一八五七年七月连续攻陷句容、溧水，十二月攻陷天京东面的镇江，构筑西起江心洲、北至燕子矶的长壕，围困天京。以钦差大臣德兴阿为首的江北大营，也于同年十二月攻陷瓜洲，进占浦口，同江南大营互相呼应，以天京、安庆为主要目标，志在必得。

石达开带了二十万部队在赣、浙、闽、湘一带流动，清朝政府要曾国藩去对付他，但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石达开茫无目标地到处流窜，不再把他当作大敌，只派湘军第二流头目带兵跟踪。一八五八年石达开在江西时，湘军李元度写了信去招降，石达开已成为敌人争取的对象。

一八六〇年，石达开到广西后，招兵买马，更改太平天国的制度。大部分官兵过去受石达开蒙蔽，这时对石达开的行动产生了怀疑，强烈要求返回天京。石达开也动摇起来，表示要“隐居山林”。跟随他的二十万军队，便在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余名军官领导下，脱离石达开，“万里回朝”，沿路奋战，于一八六一年九月攻抵江西广信，同在这里的太平军会

合。这个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很高兴，授予这支军队“扶朝天军”的光荣称号。

这时候，石达开众叛亲离，要“隐居山林”，但清朝政府不放过他。他摇头叹气说：“到处悬赏捉拿”，“无地藏身”。他无可奈何，重拉部队，带了几万人走出广西。当时四川爆发了李永和、蓝大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石达开久想取四川当“四川王”，便由贵州进入云南，进取四川。一八六三年五月，石达开从云南昭通出发，急渡金沙江，准备抢渡大渡河，进入四川。清军正在布防堵截的时候，石达开率四万部队进入紫打地。石达开强渡大渡河失败，陷入绝境。他想如果规规矩矩投降，或许可以侥幸免死，于是写了一封乞降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吹捧这个杀人魔王“信义昭著”，低声下气地要他把这封信转给清朝皇帝，请求宽大为怀。收到石达开的乞降信以后，清军在洗马姑军营竖起了“投诚免死”的旗帜。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带着他的儿子石定忠及部下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到洗马姑军营投降。在敌人军营中，石达开写了一份“自述”，乞求活命。但是敌人并没有让他侥幸免死，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在成都做了刽子手的刀下鬼。

八、防御中的攻势和 “新政”的提出

清军乘韦昌辉变乱和石达开分裂的机会，从长江南北的各个战场扑向太平军，夺去了许多地方，使太平军从前期的进攻，转变为后期的防御。一八五八年，关系到太平天国存亡的安庆和天京，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困境。曾国藩等反革命头目大为得意，说太平军已很“穷蹙(音促 cù)”，“不患今岁不平”，反映了局势的严重性。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洪秀全提拔了多年同敌人血战的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青年将领以及李秀成。他们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发动攻势，打击来势汹汹的敌人，保存了自己。

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锻炼出许多英雄人物，陈玉成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参加起义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和许多参加太平军的少年一样，当童子兵，随同战斗队伍冲锋陷阵。陈玉成在童子兵中表现十分出色，很快被派为童子官，做了童子兵的头头。他常常担任登高涉险的困难任务，乘敌不备突然发起冲击，一转眼又飞奔而去，搅得敌人昏头转向。随后，他担任正式军职，在一八五四年围攻武昌时，带领五百人从梁子湖

绕到武昌东面，以三百人佯攻，自领二百人爬上城墙，摇旗大呼：“天兵到了！”守城清兵立刻惊散，夺门奔逃，太平军便占领了武昌；一八五六年春，他以孤舟冲破重围，救援镇江，都表现了他的勇敢机智。多年来，那里敌人最多，他就冲向那里。这时，陈玉成在天国的艰危中肩负起前军主将的重任，更是责无旁贷了。

一八五八年八月，陈玉成会同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李世贤、黄文金等，在皖北枞（音聪 cōng）阳开军事会议，研究如何打破对天京的包围，确定采取攻势和联合作战的方针。会后，陈玉成攻下庐州，进军滁（音除 chū）州乌衣镇，与另部太平军会合。九月二十五日，在乌衣镇大败江北大营头目德兴阿和安徽军务钦差大臣胜保的军队，歼敌四千。第二天又在江浦附近打败江南大营的救兵，乘胜直捣浦口，陈玉成攻打德兴阿的前阵，另部袭击他的后方，九洲的太平军也浮水前来助战，前后夹击，歼灭江北大营一万多人，随着攻占了江浦。十月初，太平军前锋打到扬州，德兴阿弃城逃跑，太平军又克扬州。经过以浦口之役为主的一个多月战斗，再次打垮了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

继浦口战役之后，是著名的三河大捷。

当太平军正在同江北大营鏖战的时候，湘军从安徽太湖分路向安庆、庐州进犯。十月，湘军干将李续宾率重兵由潜山、桐城、舒城一路杀过来，十一月初到达三河。三河镇在巢湖西岸，距庐州九十里，原来没有城垣，太平军经略皖北后，在

镇上筑了城，建砖垒九座，作为据点，积聚粮食、军火，接济庐州以及天京。湘军到后，攻破了九座砖垒。陈玉成得知三河告急，自六合、江浦挥师西援，经巢湖、庐江昼夜疾趋，十一月七日直插白石山和金牛岭，包抄三河后方，扼住李续宾的退路；又叫庐州守将吴如孝截断敌人的援军，神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围击。

十一月十四日，陈玉成挥兵逼攻李续宾大营。第二天黎明，湘军反扑，冲过金牛岭。陈玉成便自督大队由左路包抄，突然从后方杀出，正值大雾弥漫，咫尺莫辨，李续宾军“只闻人声，不知向处”，顿时乱了阵脚。而赶到白石山的太平军后援部队，又立即冲上来，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乘势出击，一起杀向敌人军营。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摧毁了所有敌军营垒，斩湘军宠将李续宾和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称为湘军精锐的李续宾部官兵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曾国藩的湘军遭到沉重打击，当时湘军的老巢湖南湘乡，几乎“处处招魂”。曾国藩、胡林翼垂头丧气地说：“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胡林翼，湖南益阳人，这时任湖北巡抚，全力襄助曾国藩，是仅次于曾国藩的湘军头目。

三河大捷，太平军收复舒城、桐城，挫败和推迟了敌人对庐州和安庆的围攻，也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继续战斗、夺取胜利的士气，随后多处传来反攻的捷报。

在三河大捷后不久，一八五九年四月洪仁玕由香港来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革新建议。他的来到及其建议，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项。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村塾教师，他和冯云山是洪秀全最初在家乡酝酿拜上帝会时参与活动的人。他没有参加拜上帝会在广西的斗争，只是和洪秀全取得联系。金田起义后，他应召去广西，没有追上起义队伍，折回广东。一八五二年他去香港，接受伦敦布道会和美国浸礼会的传道，在那里结识了瑞典传教士韩山文。韩山文根据洪仁玕的口述材料，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记载了洪秀全和拜上帝会早年活动的历史。一八五四年洪仁玕从香港到上海，准备去天京，那时苏州、常州一带都在清军控制之下，难于通过，没有去成；想投入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小刀会首领不相信他同洪秀全的关系，没有接待。他曾入教会设立的墨海书院，学习天文、历算。这年冬天，乘轮船回香港，在船上赋诗言志：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

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音灰毛 huīmáo）。

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音皮休 píxiū）走六鳌。

四月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洪仁玕始终没有忘怀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一八五八年再次离港北上，经过广东、江西、湖北，一路乔装为商人或医生，躲过敌人的耳目，第二年终于到达天京。太平天国变乱发生后，中央政权的领导力量削弱了，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非常高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进封洪仁玕为干王，委任他总理朝政。在洪仁玕封王之后，接着以陈玉成战功卓著加封为英王，还封了其他几个王，形成后期的领导力

量。

洪仁玕长期居留香港等地，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懂得世界大势。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发展，热烈地希望中国改变旧貌，跟上世界发展的趋势，后来又根据他来到天京几个月所了解的情况，加以综合论列，向洪秀全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政纲——《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开头说事物的变化发展，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道理，作为通篇建议的论据。通篇的基本内容，包括“用人”和“设法”两部分。洪仁玕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耳”。在“用人”方面，他强调要“禁朋党之弊”，反对在革命队伍内部“结盟联党”，树立山头，主张“强本”，即加强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宗派、分裂现象而提出的。他还指出，“凡属妖头鬼卒，喉舌模糊”，都是设制“陷坑”破坏革命的，更要警惕。

“设法”方面，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借鉴，对政治、经济、社会提出了整套革新要求，是《资政新篇》的中心内容。关于政治，主张“权归于一”，通过新闻纸、告密箱，发扬“公议”，沟通上下关系；设立“乡官”和“士民公会”，推行地方自治；设立“钱谷库”，实行会计制度；澄清吏治，禁止私门请谒，卖官鬻爵（音育 yù）；改革刑罚制度，宽待轻犯，处理重犯要先宣布罪状，等等。关于经济，主张发展交通运输，包括兴建铁路、公路以及修浚河道、行驶轮船、兴办邮政等；发展金融事业，包括兴办银行、发行纸币、推广保险等；还有开采矿藏、兴修水利、奖励技术发明等，这些都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

路的。关于社会,主张发展文化卫生事业,办学校,办报纸,办医院;奖励慈善事业,办社会福利和慈善团体,如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堂等;禁止封建迷信,凡庙宇寺观和阴阳八卦,均应废除,僧尼道士还俗;禁止贩卖人口、使用奴婢以及溺婴;革除缠脚、金玉饰品、养鸟斗蟀、游手好闲等坏习气,移风易俗,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封建的落后腐朽生活方式,建立一个有组织、有朝气的社会。

洪仁玕还对比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中国应当仿效英、美之“法”,使自己富强起来。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以及进行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干涉内政,不准他们擅自进入中国内地,不准诽谤太平天国的“国法”。反对清朝统治阶级过去“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说:“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主张以平等的原则同外国交往。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非常重视,在审阅中,逐条批上“是”或“此策是也”字样,只有两条表示了不同意见:一条是对设新闻官,专收各省及万方新闻篇,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另一条是对刑法方面的戒杀主张,批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反映了洪秀全警惕敌人、坚持革命的态度。《资政新篇》经过洪秀全认真批注,然后镌刻颁行,因此其中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也可以说正是洪秀全的设想,是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组成部分。

《资政新篇》虽然颁布了,但在太平天国紧张的战争环境

中，是很难得到实施的。同时，作为一个全面的政纲来说，它没有触及《天朝田亩制度》已经提出的土地问题，还把侵略成性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看作是讲“信义”的，这又是它的不足和局限。尽管如此，《资政新篇》毕竟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和思想影响的政纲，而且洪仁玕在他执政期间，力图挽救“事权不一”、领导多元化的不利局势，批评那些“动以陞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官迷；提倡“文以纪实”，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文体，指责“吟花咏柳之句”，“空言无补”，反而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不读；力破封建迷信，要人们切不可拜人造的“木石死妖”——菩萨，说菩萨是魔鬼，是木石、泥塑、纸画的东西，“有目不能见，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作，有脚不能行”，都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曾用通俗的诗歌体唤醒人们说：“世俗纷纷祀偶神，金泥木石假形身，形骸虽肖何知觉？



《资政新篇》

庙貌徒严妄设陈。”所有这些,都是在局部地推行他的新政纲领,而在文化上破旧立新的主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九、天京再次解围和大军东进

在洪仁玕担任军政重任后，面临的军事形势仍然很严重。

那时，天京在和春、张国樑的江南大营包围下，长壕逶迤数十里，大小营垒百余座，长江下游也被清军的船只封锁，比向荣对天京的围困，有过之无不及。要解围，硬攻是有困难的。针对这种情况，一八六〇年初，洪仁玕向主要将领提出了出奇制胜的战略，他说：“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州）、杭（州）虚处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就是说，要发兵攻打湖州、杭州，调动清军驰救，然后乘隙蹈虚，回攻江南大营，就可取胜。

按照这一战略计划，李秀成、李世贤等向杭州、湖州进军。二月，太平军攻克杭州。果不出洪仁玕所料，江南大营派出一万三千余部队援救杭州。当敌援接近杭州，太平军在城厢内外遍插旗帜，迷惑敌人，随即撤出杭州，经皖南迅速回师。四月，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将领在建平（今郎溪）会合，商定分军五路向天京挺进。

五月二日，天京的破围战打响了。太平军从外线包围，各路并进，攻向清军阵地，天京城内的部队也分头出击，江南大

营头目和春、张国樑招架不住，节节败退，陈玉成率领部队首先突破天京西南的长壕，各路太平军乘势猛攻，至六日，摧毁了从天京得胜门外到江边的清军营垒五十余座，和春、张国樑率残部逃奔镇江。太平军再次扫平江南大营，解除了敌人三年来顿兵城下的长围。

解除京围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洪仁玕和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齐集天王府，谒见洪秀全，为了不停顿地夺取新的胜利，当即讨论了下一步进兵的策略。陈玉成以为清军集结皖北西路，目标指向安庆，应发大兵西攻，解除对安庆的威胁。李世贤却有意东进，想经略长江下游财富之区，向浙江、福建发展。洪仁玕综合了他们的意见，指出苏州、杭州、上海地区离天京不远，“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下游得手，利用这些地区的人力物力，然后上取江西、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这样，敌人对安庆的困扰也就不在话下了。洪秀全同意洪仁玕提出的方案，决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这个全局性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后来因为外国侵略者阻扰而受挫，那是始料之所不及。

五月十五日，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领大军东征，十七日进至丹阳，和春、张国樑拼凑队伍前来抵御，被彻底消灭，张国樑受伤，打马奔逃，连人带马落河溺死；和春逃到浒墅关，在惊恐中，以烧酒吞服鸦片自杀。太平军连克常州、无锡，六月二日以潜伏的小刀会群众为内应，不战而克苏州省城。接着，先后占领江阴、吴江、崑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以及浙江嘉兴等地。陈玉成率领另一支大军由宜兴进入浙江，攻占于潜、

临安、余杭等地，逼近杭州。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太平军以凌厉的攻势，取得江南大片地区，便以苏州为首府，包括周围的二十多个州县，建为苏福省。

当太平天国的东征军攻下苏州等地，乘胜直指上海的时候，外国侵略军竟悍然出面阻挠，横加破坏。为了说明这一事态的发生，有必要回顾一下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革命实行干涉的经过。

早在太平军向长江胜利进军的当初，英国在上海出版的周刊《北华捷报》，就表示要公开支持清朝政府，干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五日《北华捷报》的社论说：“起义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敌对行动的信号”，“清廷的瓦解，对我们只有坏处而无好处”。

这家报纸，反映了英国政府的企图。同年一月十三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致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的一份秘密信件中提出，要求英国立刻占领镇江，由英国舰队封锁运河和长江支流。阿礼国解释说：“高压措施的采用，是同中国在任何交涉中取胜的保证。”阿礼国早就怀着这种不可告人的动机，他所考虑的是：要出于清朝政府的邀请，才师出有名。当年一月底，阿礼国在接到清朝江苏巡抚的请援照会后，又给文翰写了一份报告，主张由英国一国，或由英、法、美三国联合，立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便向清朝政府“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鸦片合法化”，等等。二月，文翰率领军舰来上海，准备和清朝两江总督谈判条件，以便在获得“报酬”的保

证之后，向太平天国武装进攻。

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侵略者的意料之外。文翰到达上海的前两天，太平军就攻克了东南地区的重镇南京，并且立即占领了镇江。英国侵略者预定的侵略计划被打乱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驻中国的公使，先后到天京刺探消息，窥测方向。英国公使文翰于一八五三年四月底去天京，接着十二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去天京，第二年五月美国公使麦克莲也去天京。

文翰到达天京后，向太平天国递交《南京条约》的译本，企图强迫太平天国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威胁地说：“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布尔布隆除了重申条约要求外，还提出保护天主教的问题。麦克莲也提出，“美国国民居留中国境内的，都有庄严的条约的保证，但因内战发生，其生命与财产现在大受威胁”，要太平天国尊重它的特权。

英、法、美三国公使访问天京后，看到太平天国所向无敌的军事胜利，极有可能统一全国，因而在一个时期内采取观望态度，表示“中立”，以便随风使舵：如果太平天国北伐胜利，可以同太平天国拉关系；如果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则可以获得一个在中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从清朝政府手里攫取更多的特权。文翰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

狃了”，因此，“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文翰的主张，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正式批准。法国和美国政府，也采取这种“中立”政策。

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外国侵略者和江苏巡抚勾结，在上海县城和“租界”之间筑造围墙，切断小刀会的给养；外国军舰还连续发炮轰城，屠杀起义军和居民，同时借机夺取海关大权。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海关被焚，上海道吴健彰逃入“租界”，海关业务中断。英国竭力阻挠重建海关，外国商船乘机拒不纳税，把上海变成了他们的“自由港”。延至一八五四年六月，外国领事与吴健彰订立海关章程，由英、法、美各派一人监督收税，轻易地把上海海关拿到手里，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的开端。这就不仅扩大了他们在上海的侵略权利，而且事实上已在干涉中国人民革命、打击太平天国。

一八五六年十月，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年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夺取开放长江各口等特权，从清朝政府手里得到了从太平天国那里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这时，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已经失败，势力限于长江的中下游，而长江中下游又是外国侵略者视为大利之所在，亟谋开放的地区。一八五八年十一月，英国特使额尔金带领军舰，从上海溯江西上，冲过天京、芜湖、安庆，不听太平军的制止，开炮轰击，一直上驶到汉口。在回程中，停泊天京江面，多人登岸接洽，窥测情况。外国侵略者认为他们的观望和等待，已日见分晓，是撕开“中立”的面纱、公开干涉太平天

国革命的时候了。

就在一八六〇年太平军席卷江南、准备攻打上海的胜利声中，五月二十六日，英国公使卜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联合发表公告，叫嚣要出兵守卫上海，公然把上海置于他们的“保卫”之下，以阻挠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卜鲁斯向英国外交部写了许多报告，谩骂太平军为“一群土匪”，“绝大多数追随者来自中国危险的阶级”，“不断摧残信仰、资财和商业”等等，为英国采取干涉政策制造理由。这个仇视太平天国的西方侵略者的代表——卜鲁斯，这时便明目张胆地部署兵力，进行干涉，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急信中，说他已经决定动员海军和陆军，制止出现“流血”和“抢劫”的局面。就是说，决心要扼杀中国的革命。

外国侵略者进行武装干涉的另一个步骤，就是一八六〇年六月华尔“洋枪队”的组成。华尔出生于美国麻省萨莱姆，早年学过军事，流浪国外，曾在墨西哥及法国投军，是一个冒险分子。他得知中国在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中，频年战争，正是寻找冒险和发财的好机会，于一八五九年只身来上海。华尔很快同候补道、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董事、买办商人杨坊勾搭上。杨坊把华尔介绍给苏、松、太道吴煦（音许 xǔ），华尔表示愿意招募洋人成立队伍，进攻太平军。这些买办、官僚正欲借助洋人，自然一拍即合。他们商定：由华尔招兵，训练作战，吴煦、杨坊负责供给军械、军费，夺下一城，另外酬赏重金。于是，华尔招募了两百名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人，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洋枪队，自任头目，以美国军人白齐文、法尔思德做他的

副手。这批外国人，历年流寓上海“租界”，都是些来中国进行冒险和投机的恶棍、无赖。

洋枪队凑成刚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于七月初乘船出发，夜袭松江。太平军予以迎头痛击，华尔受伤，全军溃乱，败下阵来。华尔退回上海，重新拼凑力量，配备大量新式武器，以清军七千人为后援，又于七月中旬进犯松江。守军严阵以待，沉着应战，外城破了，坚守内城，洋枪队的洋枪莫可奈何。最后，华尔和他的喽罗，找到一个小洞爬城进去，才袭取了松江。华尔得到了十三万三千元的犒赏。

华尔袭取松江后，中外反动派大加鼓励。这个冒险分子得意忘形起来，又于八月初旬率领他的洋枪队，在万余清军的配合下，两次进犯青浦，两次都被太平军打得惨败，后一次败得更惨，伤亡了两三百人，清军伤亡尤多，还给太平军输送了一批洋枪、洋炮。华尔自己也受重伤，用轿子抬着才同败将残兵逃回松江。太平军一直紧追到城下，给这些外国侵略者尝到了铁拳。

外国侵略者的干涉、破坏政策，却没有引起当时负责东征军事的李秀成的警觉。还在六月下旬，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不久，李秀成就写了一封信投送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说明太平军占据松江、进军上海的必要，请英国公使和其他国家的公使，到苏州去会商，“结今日之新盟”。这封信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答复，反而使外国侵略者得到了太平军要进攻上海的确实情报，加速进行防御准备。七月十日，李秀成又写一封信给英、法、美三国公使，虽然指出了松江的大河中“有洋船三五只，炮

不绝声”，以及上海城内外国兵勇“助妖坚守”的事，但仍然希望外国侵略者“推诚相与”，自动撤退。

太平军在青浦击溃华尔的洋枪队后，照预定计划，八月十七日进军上海，扫荡城外清军。十八日，李秀成怀着极大的幻想，通知各国公使，声明大军到上海，不干扰外国人，外国人只要在房子上挂上黄旗，便于识别就行了。当日，他只带轻兵三千人进驻徐家汇，以为不要经过太大的战斗，就可进入上海城。可是，太平军开到城门前，看到的不是黄旗高挂，而是站在城头上、端着洋枪瞄准太平军的外国侵略军。他们的枪弹顿时从城上扫射过来。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竟严禁还枪，太平军因而遭受重大伤亡，只得退兵。太平军东征的最后目标，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的干涉政策破坏了。

虽然如此，一八六〇年毕竟是太平天国后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十、安庆保卫战前后

太平军的东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战斗任务即第二次西征，紧接着提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标是远征武汉，在战略上是向上游进军，取得胜利，以粉碎清军对安庆的围攻。

自一八五八年五月九江失守后，湘军步步向皖南、皖北逼紧，安庆已成为天京上游最关紧要的屏障，这个屏障如果发生问题，清军就可直接压向天京。洪仁玕借用古人把长江比作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腰，江浙为尾，说“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形象地指明了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

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更把争夺安庆作为打败太平天国的关键。当一八六〇年上半年太平军歼灭江南大营，扫荡苏、常地区时，清朝政府大为震惊，把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查办之后，又处以死刑。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内，即实授为两江总督，派作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都归他指挥，付予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全权。清朝政府急如星火地要他把湘军拉到江浙战场，夺回苏州、常州，保护上海、杭州。曾国藩的贼眼却死盯着安庆，向皇帝陈

奏他的反革命战略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音铃 líng)而下乃能成功。”就是说，他要夺取安庆，造成由上而下的有利形势，以控制金陵(天京)，因此图谋安庆的大军万万不能调动。当时湘军分作三路：曾国荃一路扑向集贤关，逼近安庆；多隆阿一路由桐城进犯；李续宜一路为后援，应接以上二路。胡林翼等设大营于英山，继移太湖，直接策划皖北军事。曾国藩的老营(指挥部)由宿松移驻皖南祁(音其 qí)门，装作要向苏、常进兵的姿态，实际上是要牵制从南路增援安庆的太平军。曾国藩的这个部署，是在“力破安庆一关”，作为他们安危“转旋之机”，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太平天国根据敌我双方阵势和既定军事计划，一八六〇年九月，决定分南、北两路大军西上，北路军由陈玉成率领，沿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南路军由李秀成率领，从长江南面，经江西入湖北，又以李世贤、杨辅清等部配合南路军进攻。南、北两路大军，约定于一八六一年四月在武汉会合。

陈玉成的北路军，一路奋战，跨过皖北，沿长江北岸，由霍山进入湖北。一八六一年三月攻下黄州(今黄冈)，黄州离汉口只有百多里，以此作为进攻武汉的军事据点。但太平军一到黄州，外国侵略者又钻出来说话了。

这时，窜到汉口窥探长江情况的英国参赞巴夏礼，带同两个英商代表，到黄州会见陈玉成，说什么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场”，“太平军夺取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贸易，因此我劝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又利用南北军情不通的情况，胡说太平军的南路军“尚未进入江

西”，恐吓陈玉成“势将得不到其他各路军的支持，而不得不单独与守卫武昌的清军作战，同时还得对付从后面袭击的安徽军”。在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下，陈玉成踌躇起来，一面把矛头移向麻城、德安等地，展缓对武汉的攻势；一面派人回天京请示。陈玉成继因会师的期限已到，李秀成的南路军仍无消息，而驰援安庆的心情又很迫切，便留下赖文光驻守黄州，于四月中旬撤军回皖。当天京的命令传到，要他照原计划向武汉进军时，他已离开湖北东下了。

李秀成的南路军为什么没有如期赶到湖北会师？原来，当年九月决定南、北两路大军西上时，李秀成却留恋他的苏、常根据地，迟迟其行，到十月才出发，在皖南和湘军打了几仗，年底逼近曾国藩的祁门老营。曾国藩恐慌万状，说太平军离他的老营“仅八十里，朝发夕至，毫无遮阻”，“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在军情最紧急时，曾国藩下令部下愿走者走，自己写了两千字的遗书，送往老家，准备一死了之。不料李秀成怕打硬仗，竟绕道行军，放过了曾国藩。在由江西到湖北的路上，李秀成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顾会师期限，多处招收队伍，又耽搁了许多日子。因此，南路军到达武汉前沿的兴国和武昌县（今鄂城），已是一八六一年六月，贻误了两个月，致使陈玉成以得不到南路军的接应，只得回师皖北。

但是，南路军的兵将很快攻下通山、通城、嘉鱼、蒲圻（音其qí）、咸宁等地，占据了武昌外围的许多据点。胡林翼闻警，不得不由太湖率兵西上，回救武昌，表明湘军在皖北的布局，已经受到影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而指挥南路军的李秀成，

却在兴国驻所接见英国的汉口领事金执尔，听信金执尔蛊惑不去进攻武汉。他还托金执尔由汉口下驶之便，带给陈玉成和赖文光两封要函，结果都被这个英国外交官扣留，后来成为英国博物馆的展览品。这时，李秀成所部军队已达五十万，如果同黄州的赖文光密切配合，直捣武昌，大打一场，牵动全局，即使一时攻不下武昌，也可以改变安庆受困的局面，把军事上的主动权夺过来。可是，李秀成要保持他的力量，去经营江浙，竟放弃夺取武汉的全局性战略任务，拔脚向江西、浙江退军，全部断送了在上游取胜的战机。李秀成这种不战而退的举动，连太平天国的敌人也感到惊奇，几年后，他们审讯李秀成时，问：你进兵到湖北，如果攻打武昌，安庆之围可以立解，为什么不战而退？李秀成吱吱吾吾，说是算计不周，“抑亦天意”。

会攻武汉的计划既已失败，太平军就不能不在安庆打一场硬仗了。一八六一年四月，陈玉成由鄂北挥师赶回皖北，立即投入保卫安庆的战斗。

安庆已被包围了一年，曾国荃深沟高垒，步步为营，在安庆外围掘了三道长壕，一道用来阻挡城内太平军出击，一道用来防御太平军增援，一道护卫后方。多隆阿部一万多人和李续宜部一万多人，分别屯于桐城附近，专门堵击从桐城来援的太平军；鲍超部五千多人驻扎于安庆对岸；杨载福部水师扼守沿江许多隘口，以作声援。他们重兵包围，是要置安庆于死地。

四月下旬，陈玉成由宿松、石牌（今怀宁）东趋，进至集贤关附近，逼攻围城湘军；洪仁玕、林绍璋自天京率领援军会合

吴如孝部，也自新安渡开至城外的练潭一带，开始了对安庆的争夺战。双方阵势犬牙交错，内线外线互相包围。经过五月里的几场激战，洪仁玕等的援军均不得手，到六月初，原由勇将刘玲琳坚守的集贤关、赤冈岭营垒，又被攻破，太平军的消耗很大，已处于不利形势。

为了挽救局势，陈玉成再次组织援军，八月间会同杨辅清、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将领，分路攻向安庆。经过十几天艰苦奋战，攻破了集贤关，继又打进敌人的第一层战壕。城内守将率兵接应，猛扑十多次，终被阻隔，不能会合，而城内粮食已断。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清军用地雷轰塌西门城墙，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和全军一万六千多人，一直战斗到最后，全部牺牲。

悲壮激烈的安庆保卫战失败了，安庆陷落了。太平天国的将士们在保卫安庆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安庆失守后，敌人一面对新败的太平军四出追击，一面由曾国荃领军东下，攻向天京，形势严重。但是，陈玉成及其部将赖文光、陈得才等，仍在皖北坚持战斗，皖南也还有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等部力量，要是李秀成把在浙江的战斗任务交给李世贤，自己统带大军来到安徽战场，太平军在上游还是可以重整旗鼓的。可是，李秀成一意孤行，只顾图谋江浙地区，不顾安徽关系天京安危的大局。在从湖北退师时，他逕向浙江，对紧急的安庆保卫战漠然置之，安庆陷落后又不一思补救，实在可恶得很！洪仁玕写信责备他说：上游是天京的屏

藩，你“徒以苏、杭繁华之地”，对安徽“弃而不顾”，“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希望他幡(音番 fān)然变计，支援安徽。李秀成回信，却说什么“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仍然托词搪塞，拒不奉命。

洪秀全对安庆失守深感不安，以洪仁玕、陈玉成援救无效，给他们革职处分。因此，朝政又多由洪仁发、洪仁达主张，并大封王爵。此后两三年中，封了两百多个王，给太平军的统属关系，带来了不良后果。

安庆的挫折，并没有使洪仁玕、陈玉成消沉，他们把挫折变为对自己的鞭策，勇敢地继续战斗。洪仁玕针对新败后产生的形势，写了两篇《诛妖檄文》，再次檄布清朝统治者的罪恶，号召“弃暗投明”，“各建殊勋”；提出参加革命，“不分新旧兄弟，皆视同一体”的政策，遍传全军内外，用以激励斗志，唤起革命精神。陈玉成在退守庐州后，则努力整军，积蓄力量，准备向北方发展，打出新的局面。远在安庆保卫战之前，陈玉成已有志北征，曾经派遣一批熟悉北方情况的人，深入山东、直隶活动，暗中联络，寻找内应的线索。这时经过一番休整，于一八六二年一月，由赖文光、陈得才、马融和等会同捻军首领张洛行进军河南，陈玉成自己决定统帅一军随后策应。

当陈玉成正在进行新的军事部署，湘军多隆阿、李续宜等部，又于二月扑向庐州，四面包围。围攻与反围攻的战斗进行了三个月后，陈玉成以外援断绝，便率领百战兵将四千余人向北突围，想同在寿州的苗沛霖取得联系，整顿队伍，再图发展。

苗沛霖本来是个团练头目，曾因内部磨擦，投向太平军，愿受陈玉成指挥。但这个家伙此时又已暗投胜保，他假装欢迎陈玉成到寿州去。陈玉成没有识破这个骗局，仅带少数随从坦然入城，被苗沛霖捉住，押送胜保的颍州大营。胜保要陈玉成跪下，陈玉成痛斥手下败将胜保说：“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五十营，全军覆没，尔带了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你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并说：“若非中苗沛霖之计，亦不能将我擒住。”胜保还想劝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胜保将陈玉成解送北京献功，听说太平军和捻军准备拦截囚车，便在河南延津途次，将他杀害。那是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陈玉成才二十六岁。

陈玉成是太平天国优秀的青年将领，他忠心耿耿，把年轻的一生献给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后期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里还应补述一下东南的战局。那是在一八六一年五月间安庆保卫战吃紧的日子里，李世贤由江西进取浙江，两三个月中，连下常山、遂安、衢（音渠 qū）州、龙游、金华、遂昌、处州、永康、严州等地，占领了浙南、浙西的大部分地区。李秀成从湖北退军，在安庆失守后，也从江西进入浙江，在严州同他的堂弟李世贤会晤，然后由富阳破余杭，进围杭州；并分军由萧山破绍兴，指向宁波；李世贤又于这时连续攻占温州、台州等城市。当年十二月九日，黄呈忠、范汝增部就占领了浙东的重要商埠宁波，省城杭州也在二十九日被攻下。至此，浙江的大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军所有。

太平军在浙江的胜利是神速的，给了敌人以很大打击，曾国藩大叫浙江“全省糜烂，无可筹划”。但是，这个胜利并不能弥补太平天国在上游失去安庆的损失，李世贤后来也很懊悔，说：“上年我军不守徽省，而走入浙江，是第一失着。”这个不服从全局战略的错误，责任完全应该由那时作为南路军主将的李秀成来负。而且这个胜利也是十分不牢固的，李秀成从湖北、江西招收大量人马，把队伍扩充至七十万人，不少地主团练、流氓土匪混了进来。曾国藩说李秀成“尽占富庶之要区，广收官军之降卒”，敌人口中也道出了李秀成的招降纳叛行为。正是被他搜罗的队伍，在浙江胜利进军时，强抢乱杀，破坏了太平军的声誉，影响民心。这些人，随后在清军进攻时，很快又成为反戈相向的叛徒，从内部瓦解太平军。

当太平军席卷浙江时，湘军的水陆师正沿着长江东下，直扑天京，曾国藩奏请派遣左宗棠，带领一支军队进图浙江。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是个反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原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那里作幕僚。曾国藩早就看中了他，把他纳入湘军，任为帮办军务，叫他招兵买马，领军作战，取得反革命的实战经验。左宗棠入浙不久，就做了浙江巡抚，成为镇压浙江太平军的主要刽子手。

十一、和外国侵略者对阵

早在一八六〇年七、八月间，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地区对太平天国革命，就开始了武装干涉。但那时，英、法侵略军正在华北进行侵略战争，《天津条约》还没有落实，它们同清朝政府之间尚有猜忌。一到这年十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它们把清朝政府制服了，把开放长江各口等特权视为既得利益，于是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干涉，就更加疯狂起来。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马上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说：

“全局(中国)的事情现已改变了。从前中英为仇敌，今则我们与中国政府已有极友善的关系，我们现已能与最高级的政府(清廷)作直接交涉，而从前则为地方政府或各省督抚所阻遏。……如果藉我们予以友善的援助，而能致令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指帮助镇压太平天国，恢复清朝在南方的统治)，且看前途商业之大发展啊！这商业是可以预期其必兴的。”

他是说，英国已从清朝政府得到满意的侵略权益，如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他们在中国掠夺财富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连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的妻子在她的日记中，也兴致勃勃地写道：太平天国“将被彻底平定，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

的谈判将更易进行”。

恭亲王奕訢(音亦辛 yìxīn)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是和外国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的主持人。咸丰皇帝死后,他当了议政王,认为外国侵略者只是“肢体之患”,太平天国才是“心腹之害”,对外国侵略者应“隐示羁縻(音机迷 jīmí)”,就是说要同它们拉上关系,以便共同对付“心腹之害”,因而得到了侵略者的赏识。曾国藩也奏称,“今该洋人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和奕訢唱着同样的调子。清朝统治者的借外国人以杀中国人的“借兵助剿”勾当,就这样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串通一气了。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面目,远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以宗教形式相同,把外国侵略者和一般外国人不加区别地都看作“洋兄弟”,曾经对西方列强产生过幻想,好心地以“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以为自己正义的革命事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是不退让的。当一八六〇年外国侵略者破坏太平军对上海的进军时,他们一再抗议,表示了极大的义愤,这时看到外国侵略者的磨刀霍霍,更毫不犹豫地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就在《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那个一度率领舰队窜入汉口的英国侵华特使额尔金,当即训令在上海的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又译贺布),要他率领“一队海军大舰队——大至足以令

人敬畏——应在南京出现”，对太平天国实行恫吓。一八六一年二月，何伯率军舰六艘，由吴淞口出发，上驶长江。到天京后，派舰长雅龄上岸提出照会，说他们已取得开放长江的权利，现在“奉命停泊南京，以便行使职权”。何伯续向汉口侦察，回驶时，又对天京进行威胁说，“英、法政府已明令：如太平军企图开入上海或吴淞，将受武力之阻止。此点既申明，则太平军之到该处地方，实于己无益，且或引起冲突，所以甚欲太平军以后不开到距该地两日路程之遥”。外国侵略者的舰队，可以在中国的海上、江上横冲直撞，却不许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革命，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贯的强盗逻辑。但是，太平天国以第二次进军上海的坚决行动，回答了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

太平军于一八六一年底攻克杭州后，次年一月，谭绍光等将领分兵五路由苏、杭出发，再次向上海进军，传檄中外各界人士，宣布上海为“必收之地”。太平军迅速扫荡了上海外围的清军，在奉贤打败华尔的洋枪队，包围了上海。

一八六二年初，当太平军进图上海的消息传出来，上海的中外反动派立起恐慌，赶忙组织“中外会防局”，筹划对策。随着太平军攻势的展开，英、法侵略军公然在上海分区布防。二月，英国陆军司令麦克尔带领九十九联队和炮兵一部，从天津开到上海，华尔也赶来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头目直接挂钩，扩充洋枪队。外国侵略者正式组成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反革命联军。

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这些敢于来犯的外国侵略者，进行

了坚决的反击。

二月，太平军进至浦东一带，逼近上海城，在高桥同侵略联军鏖战，打伤了白齐文，太平军也受了损失。接着，三月初在离城六十里的萧塘，激战一场，太平军炮火不敌，伤亡很重。华尔在这两个战役中捞到了便宜，反动派竟无耻地把屠杀中国革命人民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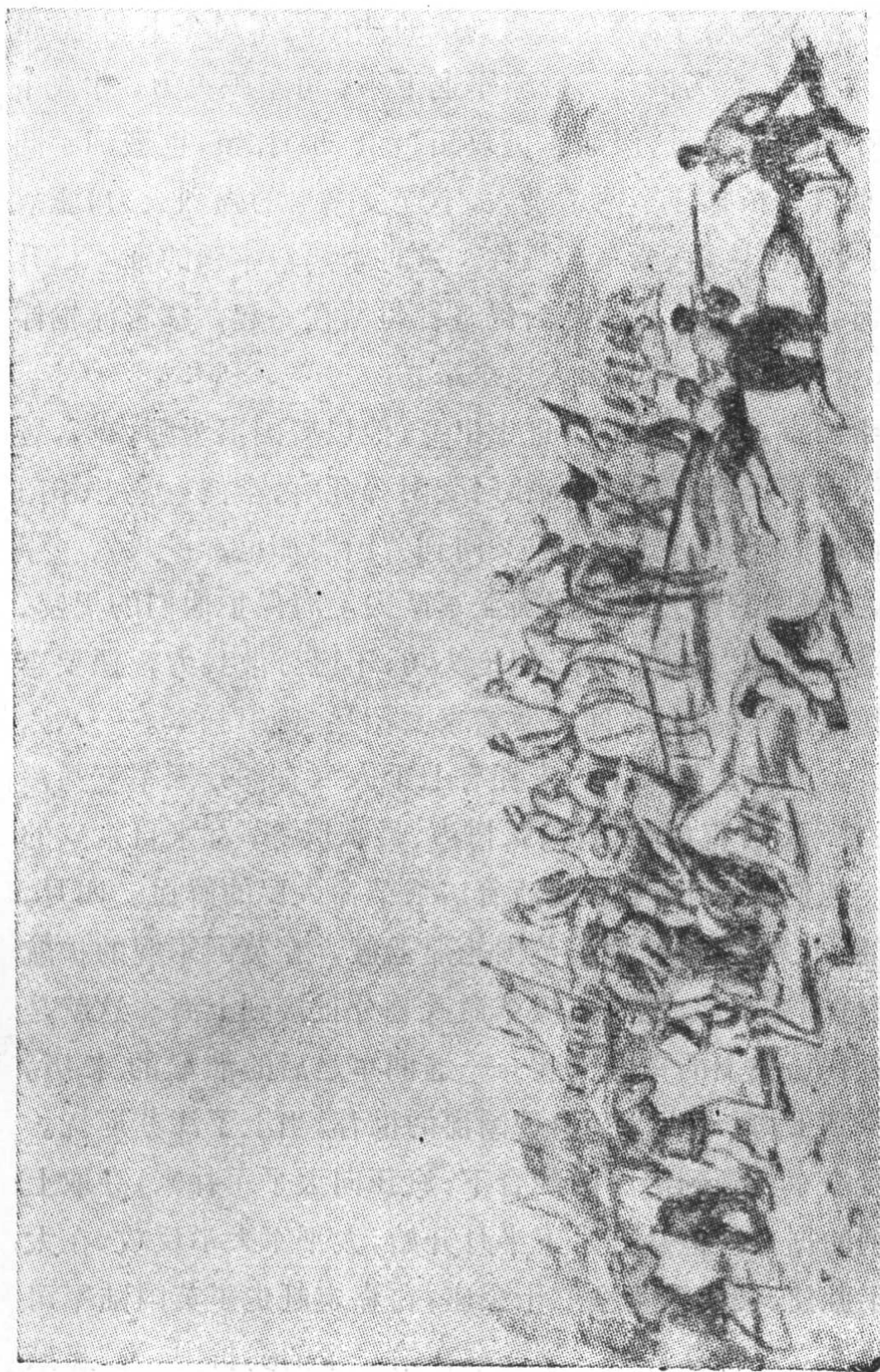
四月初，侵略联军进犯罗家港、七宝、王家沙等太平军阵地。太平军在七宝、王家沙等处虽失利，但在罗家港一役中，狠揍了外国侵略军。这次，太平军坚守离城三十里的罗家港军垒，顽强抵抗。华尔这个亡命之徒，带领他的“常胜军”猛扑三次，都败下阵来。太平军的炮火一阵阵射向侵略联军，趾高气扬的司令官何伯，只好下令后撤，一颗枪弹飞来，打中他的小腿。侵略军溃退，何伯被抬回后方。十七日，华尔、英军头目史迪佛立和法军头目卜罗德，又指挥全军人马，带着大炮，疯狂进犯离上海四十里的周浦。强盗们攻破太平军的营盘后，肆行抢掠，因互争赃物，闹闹起来。为了避免丑剧重演，事后，这些英国司令、法国司令，甚至“文明”地订立了抢劫公约，规定攻占之地，不许单独抢掠，应平均分配。

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侵略联军频繁出动，进犯嘉定、青浦、奉贤等地。五月十七日，侵略军四千六百人，拖着大炮三十尊，攻至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一千余人据守镇上，筑了围墙，挖了壕沟，有充分的防守准备。侵略军见不可骤攻，用大炮轰击了两个小时，围墙塌了，镇内一片沉寂。侵略军放胆涌进，埋伏在墙内的守军突然出现，用土枪竹矛展开肉搏战，

杀伤了不少侵略军。那个耀武扬威的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也被枪弹穿胸，当场倒毙。侵略军退下来，再组织火力，才攻下这个小镇。二十日，侵略军进攻柘（音这 zhè）林镇，也遭到了同样的抵抗。柘林守军两千多人，不顾侵略军的强烈火力，鏖战终日，寸土不让，直至全部牺牲。这时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已开到上海，他一出场就和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拿着洋枪洋炮，配合外国军队向中国人民杀来。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他以曾国藩为师，投入曾国藩军营当幕僚。曾国藩在祁门受困等死时，李鸿章离开祁门去江西；湘军夺下安庆后，他又回到曾国藩那里。一八六一年冬天，上海的官绅乞请曾国藩派军队去上海保护他们的黑窝。曾国藩正以全力攻向天京，想抢头功，不愿分散兵力，便要李鸿章按照湘军的模子，回安徽老家去招兵，自组一军。一八六二年春，李鸿章编成了一支拥有七千人（有部分湘军官兵渗入）的淮军，营官如刘铭传、张树声、吴长庆等，都来自六安的团练。他们的双手，早就浸渍着屠杀革命人民的鲜血。四月，上海的“中外会防局”雇用英国轮船七艘，在英国军舰的护航下，通过天京江面，把这支反革命武装分批接到上海。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军阀武装——继湘军之后的淮军的来历。李鸿章到上海一个月，又由曾国藩的推荐，当上了江苏巡抚。

侵略军在新到淮军的配合下，疯狂向太平军扑来，夺取上海外围的据点。但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太平军大举反攻，在太仓打了胜仗，破清军营垒三十余座；在嘉定赶走了英国陆军司令史迪佛立，收复县城。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嘉城



太平军作战图

复失”，“西兵为贼所慑”，怕出来和太平军接仗，揭了侵略军的底。六月，太平军谭绍光攻克青浦，华尔和一个英国军官从松江领军赶来援救，被打得大败，只抢出了一些人马和辎重，逃奔松江。太平军活捉了“常胜军”的第二号头目法尔思德。经过嘉定、青浦两役，左宗棠也得出一条教训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太平军克复青浦后，大军五、六万人再次围攻上海，进至法华镇、徐家汇等地，前锋直逼“租界”和县城，大战于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一带，受了损失。就在这时，由于湘军进攻天京的形势很紧，洪秀全严令回师援京。太平军留下部分军队驻守上海附近城邑，大军西返，终止了对上海的进军。

在浙江战场上，太平军和外国侵略军也进行激烈的战斗。

宁波是《南京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侵略者把宁波作为他们在浙江沿海的据点。当时有英舰四艘、法舰两艘停泊于江北“租界”前，配备了相当兵力；英国领事馆又按照华尔“常胜军”的办法，编练了中、英混合队的绿头勇；之后，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也编练了中、法混合队的花头勇，又称“常捷军”，和上海一样，组成为外国侵略联军。

当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李世贤部进攻宁波时，外国侵略者就企图干涉。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外国侵略者更视它为眼中钉，总想拔去而后快。一八六二年四、五月间，英国带队舰长丢乐德，在何伯的指示下，借口炮弹落入“租界”，横蛮地限定太平军撤去城上炮台，太平军严词拒绝这种挑衅行为。侵略军乘着清军活动，悍然开炮攻城，太平军英勇抵抗，激战五个

小时。侵略军缘梯爬城，太平军又给以迎头痛击，打伤英国军官两人，打死法国舰长一人。太平军直战到主要将领都受重伤，才撤出城来。侵略军对宁波的侵占，连当时的《香港日报》也发表社论说：“从来没有真伪不实的、无故起衅的与不合正义的（军事）行动，有如此次联军从太平军之手攻占宁波一役。”

外国侵略者为了扩大在浙江的武装干涉，把华尔的“常胜军”也调到浙东战场。在一八六二年九月的慈谿战役中，华尔躲在掩蔽物后面伸出脑袋探望，被一颗子弹击中，二十四小时以后，这个美国凶犯就死掉了。“常胜军”见头目丧了命，连忙退回上海。华尔的死，使侵略者大为懊丧，英国驻上海领事在给他顶头上司的信中说，他们对于华尔的死，“感到一种绝望的苦恼”，“因为华尔的继承人，将不知如何挑选”。太平军在打死华尔以后，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头目、法国侵略者勒伯勒东和买忒勒，狠狠地惩处了这批侵略罪犯。

华尔死后，“常胜军”头目几经更换，白齐文干不下去，换上奥伦；奥伦干不下去，又换上英国侵略分子戈登。戈登在一八六〇年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战争，干过焚烧抢劫圆明园的勾当，他自己也直认不讳地招供，曾“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戈登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资本主义强盗。

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虽然给太平天国带来极大困难，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没有被来势汹汹的侵略者吓倒，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敢于同这些横行世界的凶恶敌人对阵，作殊死战，把战斗一直进行到最后。

十二、革命形势危急

到一八六二年，军事形势逆转，太平天国处境日益不利。

曾国藩在这年年初，除了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两个头衔外，清朝皇帝又给他加了一个协办大学士的头衔，更以副相的身分指挥东南半壁的反革命军事。他的反革命全局战略部署，正着着实现：由曾国荃率领的中路军，已在这年五月合围天京；李鸿章的淮军，在太平军主力从上海地区撤出后，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装备和人数很快扩充，成为独当一面的东路军；左宗棠在浙江的南路军，也有外国侵略者帮助，实力步步扩展，牵制了全浙战局。这种架势，是想把天京和太平军在江、浙的势力，全都吞噬下去。

这时，太平军的主要力量，既要保卫天京下游，同淮军和侵略军打仗，又要援救天京，力图改变被围的困境，已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一八六二年六、七月间，太平军把主力从东战场调到西战场，汇集了二十万大军，直捣曾国荃的大营所在地——雨花台，恶战四十六天，打得湘军叫苦连天，“父子兄弟，不能相顾”，曾国荃也受了伤。但太平军终没有突破湘军的阵地，形成相持之势。到十一月，太平军消耗了大量兵

力，加上严冬已到，没有准备好寒衣，不得不从雨花台一带的战地上撤退。这次出动大军，配备了较充足的火力，却没有打破围城军，天京解围的希望已愈来愈少了。太平军撤下后，虽然又从下关渡至九洑洲，继续西上，想抄湘军的后路，以解天京之围。前军并于一八六三年五月到达六安、寿州，终因天京、苏州相继告紧，又徒劳往返地退了回来。由于沿途供给困难和遭遇到阻击，兵力再次受到折损。

在太平军主力西调的一年时间里，江苏战场和浙江战场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江苏方面。自太平军主力撤出上海地区后，上海地区的中外反革命势力，作了一番调整。李鸿章除统领他的淮军外，当地兵勇和“常胜军”都归他指挥，负责从上海到苏、常一线的反革命军事。这个部署，更加证明了中外反革命互相勾结、互相依存的关系。虽然如此，留驻东线的太平军，在谭绍光主持下，于一八六二年八月底，还一度打到上海城郊的法华寺、北新泾；十月，又攻至嘉定的黄渡等处。谭绍光努力奋战，因兵力单薄，最后虽被迫退出来，却表现了不畏强暴、坚持进攻的革命意志。

一八六三年一月，常熟守将骆国忠叛变投敌，把常熟城献给李鸿章，为反革命军队进攻苏南打开了一个缺口。跟着，敌人就夺取了太仓、崑山，逼向苏州而来。洪秀全看到苏南形势恶化，十分忧虑，痛切地传谕全军说：“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勿待更大的灾祸之莅临！”

七月，李鸿章派出全军和戈登“常胜军”，由崑山出发，

向苏州进攻，并分兵北取江阴、无锡，南取吴江。吴江、江阴先后失守，敌军于八月下旬直趋苏州，九月又派兵围攻无锡，以截断太平军后路，对苏州进行包围，李鸿章急急忙忙由上海赶来督战。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率领下，奋勇抵抗，为保卫苏州展开了顽强的战斗，使淮军和“常胜军”日复一日地消耗于坚城之外。十一月二十七日，戈登率领“常胜军”夜袭娄门外炮垒受到惩罚，被打死打伤了两百个兵将，就是一例。曾经投身太平军战斗的英国朋友呤喇，在他写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如实地描写了这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

“戈登少校、霍华德少校与威廉少校，于一时左右率兵两队向栅寨出发，留其余部队在后面列队准备，等见到信号后前进。万籁（音赖 lài）俱寂，大家都认为此举定获成功。当戈登率部下进抵栅寨附近的时候，他们不见任何动静，守兵似无查觉进攻模样。因此，其余部队亦奉命前进，同时前卫则爬入胸墙工事。几乎就在全军进入前线，以及一部分部队前去增援戈登少校的时候，反抗军（指太平军）立即开火，射出了葡萄弹、霰弹和步枪子弹，使人人为之胆寒。昆山炮队猛烈迎击，发亮的火箭和炽热的臼炮弹纷纷落入反抗军的工事内，蔚为壮观。可是反抗军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退。……戈登少校鉴于反抗军奋力抵抗，城内又开出数千援军，只得撤退，在战场上遗下了许多伤亡的兵士。”

李鸿章和戈登见硬攻不行，就采取诱降的办法，来取得他

们从战场上不能取得的东西。十一月二十二日，戈登公然致书赤胆忠心的慕王谭绍光，向他劝降。谭绍光用更加勇猛的战斗行动，回答了敌人的无耻勾当。二十七日娄门外的夜战，就是谭绍光亲自上阵，把戈登的“常胜军”打得惨败的。二十八日，李秀成从城外的望亭回到苏州，提出放弃苏州的主张。谭绍光坚持要把苏州保卫战进行到底，反对李秀成的逃跑主张。这时，苏州的其他守将郜(音告 gào)永宽、汪安钧之流已萌异志，酝酿叛变。当天晚上，汪安钧出城，到阳澄湖敌营，与早已叛投清军、成为李鸿章手下总兵的程学启，密议投降。身为主将的李秀成，得知这一严重情节，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对他们说：“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保我投(降)乎？”郜永宽之流大为感激，回答说：“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就是说，他们去投降，决不害李秀成。这一席叛徒的对话，把李秀成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也就决定了他在太平天国的危难中何去何从的打算。三十日晚间，李秀成以大势已去，对几万太平军弃而不顾，带着亲信从苏州胥门逃往丹阳。

苏州城内的叛变活动更为猖獗了。十二月二日晚，郜永宽等进一步与戈登、程学启商量投降条件：只要清军进城以后，他们的生命和私财有保障，便开门投降。四日，慕王谭绍光仍想挽回局势，在慕王府召集会议。他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宁可拚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同叛徒们激烈论争。汪安钧突然拔刀相向，刺杀了谭绍光。五日，郜永宽、汪

安钧等八个叛徒剃去头发，打开城门，献上谭绍光的首级，迎接清军进城。这些妄想用战友的头颅向敌人投降来保存自己的叛徒，就在第二天全被李鸿章杀死。由于这些叛徒的出卖，苏州的太平军两万多人遭到李鸿章残酷屠杀，另有数千人在这之前同叛徒们展开斗争，突破重围，来到无锡，继续作战。

苏州失守后，被围攻已三个月的无锡，也在十二月十二日失守。苏南战场就进入最后在常州及其周围的战斗。常州及其周围的战斗，留后续述，这里且转到浙江战场上来。

浙江方面。自一八六二年五月清军和侵略军夺走了宁波后，左宗棠率领湘军从钱塘江上游压向下游，太平军阻战于衢州一带。衢州、严州、金华等地，陆续被左军攻下，东路、南路各城邑，在侵略军和清军的攻击下，也先后失守。一八六三年夏，左宗棠围攻富阳，太平军严阵以待，顽强抵抗了五个月。到九月，左宗棠勾结德克碑“常捷军”会攻，才把富阳攻下。富阳是杭州偏南的重要据点，富阳既失，左宗棠就伙同“常捷军”窜犯杭州。

十至十一月，太平军在杭州、余杭之间的十里长街，以及城外的馒头山、凤凰山、九耀山、雷峰塔等处，同左军、“常捷军”展开激战。十一月二十八日，还乘大雾由万松岭直扑左军营盘。不幸，十二月初苏州失陷，给杭州的保卫战带来很大不利。一八六四年三月底，左宗棠占领了杭州。至此，除湖州和少数据点外，浙江都被清军夺去。

苏州、杭州丧失，太平军在江浙的全局已呈瓦解状态。然

而，守卫在常州一带的太平军，仍顽强进行战斗，表现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牺牲决心，和那些无耻叛徒形成鲜明对照。

原来淮军刘铭传等打下苏州、无锡，十二月接着就进攻常州及其相邻据点，但对常州围攻了一个多月，守军沉着应战，使敌人奈何不得。李鸿章又只好向洋大人求救。因为攻陷苏州时，在处理降将(叛徒)问题上，戈登和李鸿章大闹矛盾，戈登负气退驻崑山，声称要同李鸿章决裂。这时，李鸿章请出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调解，携带白银五万两给戈登，用保密方式存入英国银行，并为李鸿章陪不是。这个要同李鸿章决裂的戈登，立刻懊悔自己先前的孟浪，赶到李鸿章那里商陈出兵计划。

一八六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常胜军”开到金坛，看到城门紧闭，保持着神秘的沉寂。戈登对这种沉寂有些害怕，便把大炮拉到距城两三百码的地方，连续轰击了几个小时，他的队伍才从轰开的缺口爬进去。埋伏着的守军忽然一跃而起，大声呐喊，猛冲过来，刀枪挥舞，砖石齐飞，“常胜军”措手不及，混乱地败退下来。戈登命令部将柯克汉姆组织增援队伍开上去，亲自督阵，再次冲进缺口。当他刚到城边，一颗枪弹飞来，打中了他的腿部，柯克汉姆也受了伤，爬进缺口的喽罗都被打得滚了回来。“常胜军”调整力量，第三次冲上去。太平军用长矛、土炮抵敌洋枪、洋炮，经过一阵激烈的血战，又把他们击退。呤喇记述说：“攻军三战三却，蒙大损失，凡遇肉搏，皆不能敌。”反映了金坛之役的实况。戈登被迫退至溧阳，进行补充，又配合清军进攻华墅，也遭到守军顽强抵御。

四月中旬，戈登才和他的喽罗转到围攻常州城的战地上

来，李鸿章也赶来为攻城的淮军打气。守卫在常州的太平军部队，更是壮怀激烈，浴血奋战。护王陈坤书率领七八千战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多次挫败敌人破城攻势。“常胜军”用重炮轰塌了城墙，太平军战士奋不顾身地涌向缺口，前队倒下来，后队又紧跟上去，军旗在缺口上空飘扬。敌人害怕太平军的白刃肉搏，军官强迫士兵冲锋，用剑击他们，他们也不愿上去送死。到五月初，被围攻了半年的常州，仍然屹立不动。中外反动派急坏了，赫德也从上海赶来策划。十一日，淮军、“常胜军”一齐出动，攻破了常州。

城破，太平军还巷战不停，敌人进到那里，太平军就同他们拚到那里，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还据守护王府死战。太平军战士一个接一个在陈坤书身旁倒下去，最后陈坤书一个人还在搏斗，直至被擒。陈坤书就义前，慷慨地说：本欲保卫常州以为天京犄角，“奈事不成，只有尽忠”。陈坤书生前虽有不少过失，但他最后同敌人拚到底的牺牲精神，仍然是值得称颂的。

至此，江浙的城镇尽失，天京外围已无回旋余地和接应重镇，太平天国的处境更加艰危了。李鸿章、左宗棠之流，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李鸿章在攻下苏州时，得到了太子少保的头衔，左宗棠在进军杭州前，爬上了闽浙总督的位置，他们手下的喽罗，也一个个成了提督、总兵等领兵大员。为了对外国主子感恩图报，在攻占常州后，李鸿章还奏请皇帝嘉奖戈登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外国恶棍，赏他穿黄马褂、戴花翎，还授予提督的军职，彻底暴露了国内反动派勾结外国侵略者扼杀中国人民革命的凶恶嘴脸。

十三、天京陷落

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四日，苏州失守，李秀成回到天京，对革命前途表示悲观失望。第二天，他向洪秀全提出放弃天京的建议，说：“京城不能保守，曾妖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洪秀全听了大怒，不同意他的建议。

李秀成“让城别走”不成，在溧阳的侍王李世贤，约他同去江西，天京诸将反对，李秀成不得已，留在天京主持守城战事。

天京处在围困中，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洪秀全动员全城军民齐心协力，英勇抵抗，并严令：如有私拆城外清军投来文书的、通敌投降的，“抄斩全家”，“知情不报，与奸同罪”。然而，天京城内的败类不顾国法，偷偷摸摸地大干投敌勾当。鬆王陈得风与东门外清军萧孚泗兵营秘密来往，后来事情泄漏，被洪仁发拿获。李秀成出面保陈得风，代用去银子一千八百余两。这件事过后不久，又有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潜入曾国荃军营，与曾国荃的师爷商谈投降的事，对方提出要宋永祺劝李秀成投降。宋永祺来往于敌人军营，活动了十多天，并把

这场叛卖交易的详情告诉了李秀成。后来，宋永祺“酒后失言”，向陈得风泄漏了此事，还说：“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得风半信半疑，便写信问李秀成：“能有此事否？”正好这天李秀成在忠王府召开粮食会议，补王莫仕葵、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等参加了会议。陈得风的信一到，莫仕葵顺手拆开，各人也拥过来看，密谋暴露。莫仕葵拿到了把柄，对李秀成说：“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尔即调尔妻舅宋永祺到场，与我讯问。不然，我便要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于是莫仕葵安排人马，在忠王府等候。当天晚上，宋永祺正巧来与李秀成弟叙谈投降的事，莫仕葵便将他拿获。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后来把宋永祺押入囚内，准备正法。李秀成又用银子疏通莫仕葵，以“不治其罪”掩饰过去。李秀成日后在囚笼中还作贼心虚地说：“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不到今日之亡。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变心。”

这时，江浙战场的太平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陆续向外突围。第一批约八万人，于一八六四年二月初，从溧阳、广德、宁国进入天目山区，又挺进到闽、赣边界地区。第二批约二十万人，在李世贤率领下，从浙江德清向江西进发，声势很大。敌人对于太平军的行动，十分恐慌，惊呼：“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可惜太平军没有乘此时机发动进攻，使敌人得以陆续增调救兵，加强对江西的防守。当第三批约三万人从丹阳经皖南向江西突围时，遭到了严重阻挠，损失很大，只有一部分南下与李世贤会合。太平军从江浙战场突围，吸引了湘军部分

主力,对减轻天京的压力,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没有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因此并未使不利局面改观。

曾国荃为了加紧进攻,招募新军,围困天京的湘军增至五万人。

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天京钟山要塞天保城失守,三月二日敌人窜犯到天京城东北的太平门和神策门,包围愈来愈紧。天京粮食断绝,情况非常困难。李秀成向洪秀全报告说:“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要洪秀全降旨筹措,“以安众心”。洪秀全下诏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就是野草,洪秀全表示要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没有粮食,就以野草充饥。

李秀成以城中无粮,又要将城中百姓放出城外。洪秀全不同意这种涣散斗志的做法,斥责李秀成“不顾国体,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言罢大有怒色。李秀成耿耿于怀,阳奉阴违,强行密令城中百姓逃出城外。后来李秀成在敌人面前招供时,竟以此标榜自己,吹捧敌人,说什么“我在城内得悉,九帅(指曾国荃)在外设有救难民局,……正合我意,……密令放行。去年至今,各门分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数(按:这个数字不确,可能夸大了很多)。”

天京城内,太平军战士同心同德,决心与天京共存亡。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鼓舞下,太平军坚守天京,敌人虽然长期围困,却不能攻下这座革命的堡垒。四月间,曾国荃命令全军两次穿掘地道、树云梯,猛攻天京城,都遭到迎头痛击,败阵而

归。

长期的紧张和疲劳，使洪秀全的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坏下去，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终于因病去世。洪秀全的死，给正在坚持最后斗争的太平天国，带来了很大损失。

洪秀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领袖，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先驱。他领导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国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毛主席曾经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① 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纪念的优秀人物。洪秀全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当然，他身上也不是没有弱点，例如：他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对这些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等等。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洪秀全身上的反映。

洪秀全逝世后，太平天国的处境已十分艰险。洪秀全的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那时，干王洪仁玕外出征粮调援，因京外各地吃紧，久无所得，没有回京。守卫天京的太平军，处在这种危急形势下，仍然顽强战斗，把敌人阻挡在天京城外。

在太平军坚守天京的同时，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原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五四页。

在陈玉成牺牲后，率领所部远征西北，联合从四川过来的蓝二顺、李永和农民军，在汉中一带开展活动。陈得才、赖文光得到天京形势严重的消息，于一八六四年春带领大军，从陕西出发，回救天京。四月，陈得才、赖文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经河南进入湖北。河南捻军陈大喜部、安徽捻军张宗禹部，纷纷与太平军会合，队伍迅速扩大，给包围天京的清朝军队以极大威胁。清朝政府一面慌忙在湖北设置防线，以僧格林沁的骑兵为主力，另调河南、湖北、安徽等省军队，在大别山前摆开阵势，拦截太平军东下；一面严斥曾国荃进攻天京不力，在六月至七月间，连下六道命令，要李鸿章率军火速前去，帮助曾国荃攻打天京。李鸿章深知曾国藩、曾国荃弟兄，生怕别人抢功，故意迟迟不发兵。曾国荃千方百计想把天京快点攻下来，轰城更急。

天京保卫战在紧张地进行。敌人每进展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七月三日，拱卫天京的另一要塞地保城（位于鍾山即紫金山的第三峰）失守，敌人控制地保城高地，监视全城。形势更加不利，战斗已进入最后阶段。从七月四日开始，曾国荃发狂地命令各营轮流苦攻，日夜不停。

太平军奋不顾身，继续坚守孤城。太平军这种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使得敌人胆战心惊。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稿中说：这次攻城之难，鏖战之苦，“实为久历戎行者所未见”，“百计环攻，无隙可乘”，“各营轮攻，伤亡极多”，“官军五万余人，筋力将疲”，“事久变生，深为可惧”！

英雄的太平天国战士，就在孤立无援、力量对比悬殊的不利情况下，坚持战斗了半个月，守军只剩下三、四千人。七月十八日，曾国荃披挂上阵，跑到地道口，指挥士卒埋放火药三万斤。城内太平军两队各数百人，分别从太平门、朝阳门冲出，持火弹延烧各炮垒及所积芦苇。清军慌忙应战，拚死命才保住了地道洞口。十九日中午，敌人用炸药轰开城墙二十多丈，蜂拥地冲往缺口。守在城上的太平军，勇猛战斗，往下丢火药，迫使清军抱头后退。在后面督战的清军头目，举刀砍杀后退的士卒，强迫他们向前冲。经过几小时剧烈搏斗，到黄昏时分，各城门终于被清军攻破。

守卫天京的英雄们，寸土必争，与冲进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每个战士都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天京城中的太平军，“无一降者”。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太平天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反革命军队攻陷天京后，大发兽性。当时人说：“湘军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是他们烧杀抢掠的真实写照。曾国荃这个家伙，带头抢劫天王府，其他头目也争先恐后洗劫整个天京城。抢劫之后，继以大火焚烧，目击者说：“火光烛天”，“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延烧七日不熄。繁荣的天京，顷刻之间变为瓦砾灰烬。

天京陷落时，李秀成和幼天王冲出城来，在城外被敌军冲散，李秀成独自逃到天京东面的方山。他身上带了金银珠宝，被歹人发现，把他押解到曾国荃军营。在敌人面前，他低声下气地表示忏悔，乞求活命。七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

南京,审讯李秀成。李秀成对曾国藩卑躬屈膝,在敌人的囚笼中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供词)。

在这份自白书中,叛徒李秀成口口声声称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为“中堂大人”,吹捧他“恩深量广”,“仁爱感四方”,向他苦苦哀求饶命。他恶毒地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是“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咒骂自己是迷迷糊糊地参加革命,是“骑在虎背,不得不由”。为了乞求饶命,他甚至不惜以继续出卖革命为代价,向曾国藩提出,要亲自去为清朝“招降”太平天国的部队。

杀人如麻的曾国藩,并没有对这个可耻叛徒发什么“仁爱”之心,决定立即把他杀掉。李秀成知道了,却再次向曾国藩献媚,说什么“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真是无耻之尤!

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反动派弹冠相庆,急忙论功行赏,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加封曾国荃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对东南各路领兵头目,也一一犒赏。

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马上猛扑过来,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封建官僚纷纷向清朝政府提出各种建议,要各省采取切实措施,保护逃亡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从速恢复在革命期间遭到沉重打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清朝政府陆续下令各省,加紧恢复封建秩序。江南各省官僚,从各方面协同地主抢夺土地,规定“认占荒地”的工作,由地主豪绅主持,以“认占荒地”为幌子,穷凶极恶地从农民手中抢夺土地。地主“认田”,只

要开明田亩四至及完粮户名，交与主持“认田”的董事开册，再交地保赴县衙门呈报，即算有效。因此，“认田”手续非常简单，凡是能够呈验契据的，即可认占——即从农民手中夺归“原主”；无单据可以呈验的，只要勾结地保出具一张证明之类的东西，就可强占农民的土地。地主们或者自称“原主”，随处圈占土地，或者勾结衙门官吏，趁火打劫，任意霸占民田。

那些逃亡地主，气势汹汹地回来了。特别是苏南的地主，他们在革命时期携带资财逃往上海，或窜匿于长江口的南通、海门、崇明等地，在外国侵略者庇护下，逃避革命的打击。这时，他们成群结队地回窜乡里，农民在革命中得到的一点权利，又遭到他们无耻践踏。

十四、再接再厉的斗争

天京陷落后，正在安徽广德的洪仁玕，与天京突围出来的幼天王会合，一八六四年八月间来到浙江湖州，决定前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的部队，再往湖北，与赖文光领导的太平军联合，由湖北入陕西，重整旗鼓，再图发展。不料到江西以后，李世贤、汪海洋所部太平军已进入福建，没有能够会合在一起。洪仁玕和幼天王在江西先后被俘，解往南昌被杀害。洪仁玕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他从容就义，在绝命诗中说，太平天国的国运虽然中斩，“有日必复生”，对建立新国仍然寄予无穷希望。

李世贤的部队进入福建后，占领漳州等地，颁布各项政策，着手建设这块根据地。清朝政府害怕太平军在福建站稳脚跟，立即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三路“围剿”漳州。李世贤在漳州困守半年之久，于一八六五年五月战败。他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汪海洋军营。汪海洋唯恐李世贤责怪他见危不救，竟自相残杀，把李世贤刺死。汪海洋的部队转战于江西、广东边境，攻占了广东嘉应（今梅县）。一八六六年二月，汪海洋战死，部将谭体元率领战士突围时，也被捕牺牲。

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虽然停止了，但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和捻军，还在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

一八六四年底，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共推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领袖。赖文光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对捻军进行整编，提出继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口号，在黄河流域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一八六五年初，赖文光与梁王张宗禹等，在河南鲁山大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是清朝宠信的蒙古贵族，他的满蒙骑兵十分凶悍。赖文光为了歼灭这支顽敌，采取“以走致敌”的运动战，先拖垮敌人，然后寻找时机加以歼灭。僧格林沁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把捻军的运动战看作是逃跑，尾追不舍。捻军则紧紧牵住敌人不放，前后达两个多月。有时日夜急走，几天就走一千里，有时在百里之内盘旋打圈。捻军机动灵活，到达一地几天后，清军才气喘吁吁地赶到。捻军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把敌人拖得疲劳不堪，僧格林沁到处扑空，累得连手也不能拉缰绳，只好用布条把手系在肩上，来驾驭坐骑。五月十八日，僧格林沁追到山东曹县高庄，赖文光见时机已到，先用小部队分三路集结在庄前引诱敌军，而把大部队隐蔽在庄外柳林中。僧格林沁象输红了眼的赌徒，狠命地冲杀，捻军伏兵一拥而出，围住痛打。僧格林沁顿时心慌意乱，妄想逃命，但是那里逃得出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圈！怀着深仇大恨的捻军战士，举起大刀，杀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

僧格林沁全军覆没，清朝政府大为惊慌，以为捻军势必北渡黄河，直逼北京，急忙把曾国藩调来对付。曾国藩为了改变

过去疲于奔命的局面，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想把纵横驰骋的捻军，围困在运河、沙河、淮河和黄河之间，这是极其恶毒的一手。但曾国藩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当他赶到安徽临淮时，捻军早已离开山东，分兵两路进入河南。曾国藩连吃败仗，他的围困计划遭到失败。清朝政府见曾国藩不中用，便换上淮军头子李鸿章。

赖文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扩大革命力量，把捻军分为东、西两路。赖文光率东路捻军，于一八六六年底从河南进入湖北，横扫黄陂、孝感、云梦、德安等地。一八六七年初，把湘军郭松林部引诱到安陆(今钟祥)的白口镇，在罗家集以速战速决的凌厉攻势，歼灭大半。然后，又在尹隆河(今永隆河)乘淮军刘铭传部过河的时候，出奇制胜，打得它人仰马翻。刘铭传等头目都脱掉袍服、帽子，坐在地上等死。不料，这时另一支湘军赶来，从背后发炮轰击，捻军防备不及，受到很大损失，退往河南。

一八六七年六月，东路捻军进入山东，在突破李鸿章设置的运河防线时，遭到挫折，活动范围日益缩小，逐渐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抢渡六塘河一战中，主力大部分损失，冲出两千多人。赖文光在突围后被俘，一八六八年一月十日在扬州牺牲。

西路捻军在张宗禹领导下，从河南进入陕西，进展很快。一八六六年底逼近西安，刚免职的陕西巡抚刘蓉，带领湘军从华阴赶来抵挡。捻军时而东下，时而西上，在西安、蓝田、临潼一带盘旋。一八六七年初，捻军以五万马步兵埋伏于西安附

近的霸桥十里坡，等湘军进入圈套后，从左右两翼包抄，仅以半天时间，就歼灭湘军三十多营。

十里坡一战，清朝在陕西的兵力空虚，连忙把左宗棠调来稳定局面。捻军突破左宗棠的包围，进军陕北，连克安塞、延川、绥德等城，声势大振。这时，传来了东路捻军危急的消息。西路捻军于一八六七年十二月，踏过冰封的黄河，向山西、河北进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跨过三省地面，逼近河北易州。张宗禹原计划以威胁北京来解东路捻军之围，可惜东路捻军早在一个月前就失败了，由于孤军深入而陷于包围之中。捻军渡溥(音呼hū)沱河南下，在河南封丘、滑县连败清军，打到静海，遭到驻在天津的外国侵略军攻击。一八六八年八月，捻军突围到山东茌平，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战，终于失败。

4 天京陷落以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联合捻军，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战斗了将近四年，他们多次以劣势兵力打败优势的敌人，高举太平天国的大旗，继承着革命的事业，发扬了革命传统。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十五、太平天国英雄们 永垂不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这次革命坚持了十几年，革命势力几乎遍及全国。

太平天国革命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过去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无法比拟的。它建立了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组织——拜上帝会，在战斗中形成了整套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立了国家政权，和清朝的国家政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峙着、斗争着，从珠江到长江、黄河流域的亿万群众，都被卷入了革命怒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雄伟场面。

太平天国革命是带着以往的农民革命不曾有过的姿态，跃登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它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以外，还担负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革命。

众所周知，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十年中，前八十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

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①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酝酿于鸦片战争前后，爆发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九年。这时，民族矛盾已和阶级矛盾同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革命人民的肩上。显然，太平天国革命的环境，已不同于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准备阶段，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战争，不仅革命的任务加重了，就是革命的前途，也有了新的展望。因为，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原来对立的两个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内部，开始产生某些分化，新的阶级力量已经呼之欲出，这是不难从太平天国的全部历史中找到若干征候的。

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曾经表述他的政治历史见解说：“我虽未加入三合会，但尝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说反清，却不可以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洪秀全是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把他这段话和太平天国的许多文献联系起来考察，就会看得更清楚，如在不少地方揭示的人与人平等、男与女平等的思想，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是实际上要实行的“耕者有其田”主张，在《资政新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二七页。

篇》中是它所设想的资本主义蓝图,等等。都证明洪秀全所要创建的“新朝”,决不是停留在改朝换代的旧套上,而是想要改变封建制度,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

但是,那时的清朝政府,已成为英、法、俄、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外国侵略者害怕中国人民革了清朝政府的命,会断送它们的侵略利益,就在太平天国刚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把天国的伟大抱负一一开展时,便同清朝统治阶级勾结起来,用反革命武装绞杀太平天国革命。毛主席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从洪秀全到陈玉成、洪仁玕、谭绍光、赖文光等,都是怀着这种愤激的仇恨而死去的。

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结合在一起,变成比较顽固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终究是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农民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使他们不可能独立地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农民群众要求解放,敢于用武装斗争去争取解放,但在革命取得胜利时,容易被胜利陶醉,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在建都南京的胜利声中,保守、享乐、宗派等等习惯势力一齐向革命队伍袭来。驰骋于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的太平天国英雄们,在敌人面前毫无惧色,却在混浊的封建习惯势力袭击下,失去了还手之力,给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带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〇页。

来极大的危害。

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新的阶级力量还待诞生，太平天国革命得不到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不能制订出彻底战胜敌人的完整的战略和策略，虽然造成了那样大的革命声势，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最后还是不能不遭到失败。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①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

太平天国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把矛头直指以清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任务，为民主革命进行了巨大的准备。它的战斗历史，一直在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

太平天国革命对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了剧烈的冲击。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是“天生的圣明”，是谁也不能冒犯的。洪秀全把一切邪恶势力称作“妖魔”，把皇帝比作“阎罗妖”，是“妖魔”的头子。不仅他们要打倒的清朝皇帝是“阎罗妖”，历代的皇帝也都是“阎罗妖”。他说：“自秦汉至今一二千年，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这是曲折地对君主专制的否定，而反对君主专制，正是后来辛亥革命的重要课题。他们还敢于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这个精神偶像，践踏在地，认为孔老二的話一无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八页。

是处，儒家的《四书》《五经》都是“妖书”，反对替圣贤立言的封建文学。这可以说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先声。尽管太平天国革命是借助拜上帝会的教义，来锤击封建枷锁，那是因为他们还不可能找到合适的批判武器。但他们把基督教进行奴役的教义，改变为造反的哲学，为己所用，从而给顽固反动的封建上层建筑，打了有力的一锤。这一锤打得并不轻，你看，曾国藩不是在那里大叫，他们的孔子、孟子已“痛哭于九原”了吗？

太平天国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封建社会的面貌，建立一个平等的、也是平均的理想社会，这虽然只是一种美丽的设想，但它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严厉挑战。在实际斗争中，凡太平天国革命势力达到的地区，清朝的地方政权被打翻了，田契、赋册一把火，官僚地主死亡逃散，转瞬成为绝户，农民夺回了大量土地，给封建经济基础以很大打击。革命后，在长江下游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多，就是这种打击的结果。如一八六九年江苏省规定，今后“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江宁、镇江两府，受革命的冲击较大，垦辟无主荒地而获得土地的小土地占有者较多。还有些农民买进小块土地，成为小土地占有者。一八六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奏折中说：“近来江南荒田垦种乏人，类多贱卖。”有些人“买荒田为业，或自种，或招佃承种”。安徽、浙江也大致如此。浙江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田多为小户之产”的情况。例如：桐乡县“十亩以下之零星小户，统邑计之，殆无虑万数也”；龙游县，经过革命的洗礼，“业田之户，多系客民”，土地大多转移于

垦荒客民手中；汤溪县，“富户多中落，田易佃而主，自有而耕者什且七八”。这些，都说明了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使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若干变动。这一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后来长江中下游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是和太平天国打破凝固的封建障碍，有一定关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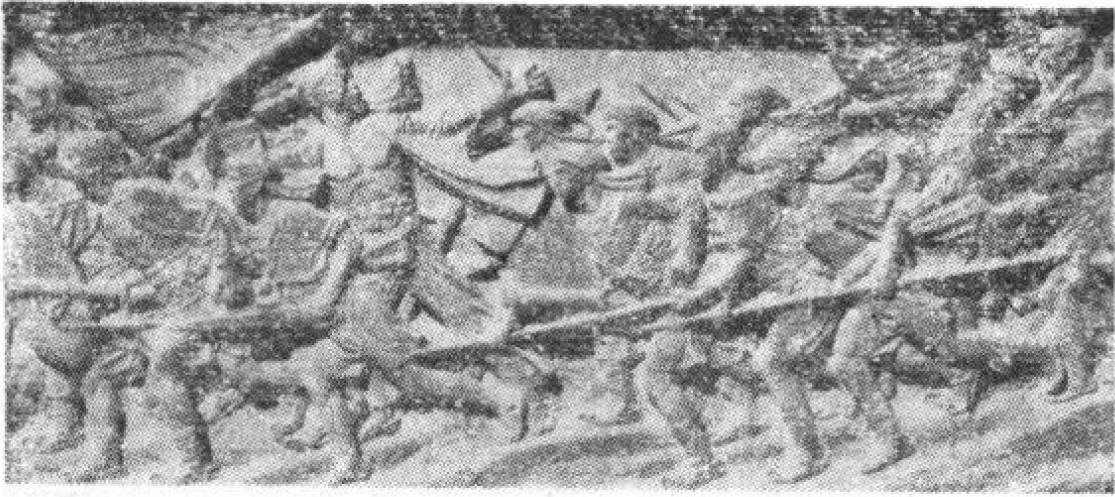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同凶横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对它们的一切侵略要求，严词拒绝；对它们的武装干涉，坚决回击，“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

太平天国革命是失败了，它的光辉业绩和历史功勋，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列宁说：“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② 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启迪了后继者走上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统治者的革命道路。

每当我们走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瞻仰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我们就会想起一百多年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革命先烈，就会想起可歌可泣的太平天国革命，就会想起洪秀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②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〇四页。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浮雕

全、陈玉成这些为中国人民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

太平天国英雄们永垂不朽！